

文成文史資料

K295.50328

H4

V.5

第五輯



目 录

玉壶镇简史·····	余序整 (1)
畲乡风情·····	钟维发 (10)
抗日时期大岙合作社·····	金士盈 (16)
抗日期间大岙卷烟业·····	陈永孚、赵义方 (20)
我县第一台动力机器·····	赵义方 (25)
龙溪梅熟话退兵·····	赵祝炎 (27)
闲话电话·····	赵义方 (33)
漫话“银背”·····	赵超植 (36)
李山村禁赌石碑记·····	胡克苗、胡冠绍 (39)
群策群力，建造知识宝库	
——筹建伯温图书馆记实·····	刘久持 (42)
记黄坦王宅天主教·····	邢碎平 (49)
傲雪斗霜，迎来春色满园	
——记华侨胡志光一家·····	余序整 (52)
博大的胸怀，高贵的品质	
——记蒋文忠先生数事·····	吴鸣皋 (59)
三世启蒙，耕耘百载·····	朱茂海 (64)
钟德章与培头小学·····	钟维发、钟丙义 (69)
晚清文举人林绍年·····	陈圣庆 (72)
广生秤的始创人·····	赵祝炎 (75)
缅怀父亲刘志邦的一生·····	刘宝怀 (79)

施东昌小传.....余序整提供（84）
我县名京胡琴师陈珠妹.....吴 亮（89）
南田镇的联簪坊.....刘久持（92）
珊溪群众反丁斗争始末.....夏叔平（94）
桂山吴地山战斗史实.....包学冠（100）
林海春秋
——国营文成石垟林场场史.....徐世槐（104）
编后话.....（118）

主 审：徐定梁
责任编辑：周正良 陈 夫 张雨明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玉壶镇简史

余序整

文成县玉壶镇是浙江省著名的侨乡之一，位于县城东北面的飞云江支流玉泉溪(又名芝溪)南岸，四面环山，总面积15.8平方公里。辖有11个行政村，2473户，11188人，除黎族1人，畲族22人外，余均为汉族。

玉壶是个小盆地，口小腹大状似壶，冠之名贵之玉，故称玉壶。地人有诗云：“乡村百落一川口，境内千峰四面罗；大腹瓷瓶尖小嘴，比喻拟作称玉壶。”

镇内主要水流有芝溪。一泓清水从西北入境，流形似“之”字，文人加以修饰，名芝溪。镇境四面环山，层峦叠嶂一较大的山有凤山、九龙埒顶、吴山尖、陈山、西山寨等。故有壶山芝水之称。

宋代之前，壶山古木参天，群山麓下荆棘丛生，芝水流经之域尚属沙滩，至宋代初期壶山始有人烟。

据《胡氏宗谱》载：宋太宗雍熙四年（988年），胡氏始祖孟迁从胡阳徙迁安固（今瑞安）嘉屿乡胡岙（西距玉壶一二公里处）。经七传至八世孙公远分居壶山象岗（据传今之象岗井路后是其初来的屋基）。此后，经过历代的繁衍至明清已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宗族，并有改造自然与抵御外患的能力。据《瑞安县志》载：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筑南北两节长约千丈的“玉壶砾”（北起砾头南至子母宫“又名元帝宫”），改水的流向为之字形。永乐甲申（1416）建造了“玉泉寺”（又名崇福寺），弘治甲子（1504）重创胡氏大宗祠（今区公所驻地）。为了防御闽寇侵扰，于嘉靖壬子（1552）建筑了“狮岩寨”壁城，为改变壶山风水，于清雍正七年（1730）在南方高筑了巽峰。清同治七年（1868）建造了佑善亭（县文物保护单位）。

到了清代是壶山民众就地取材大造有楼

之房的鼎盛时期。康熙年间(1662—1722年)，胡氏在西山眠牛腿下首建有楼之房(今仍称此屋为“楼”)，雍正年间(1723—1736)，胡氏在楼之下首建了一座三进四面的四合院——“金砬”，与此同时继建四合院的有“上新屋”(以上均属底村民房)、“下新屋”(中村)、“外新屋”、“底新屋”(上村)、外楼“老屋”(外村)。雍正年间有蒋氏始祖一忠从青田钓滩来壶在横山脚下建“蒋宅”一座(上村)、高氏从青田山炮来壶在底头建“高宅”一座(底村)、乾隆年间(1736—1796)，邓氏始祖然恩从青田万阜来壶在店桥头开药店一间(中村)、余氏始祖玉钦从平阳林垵来壶建“余泰宁”一座(中村)。除此之外底头尚有“陈宅”、“沈宅”民房(因二氏现无宗谱，无从考查)。至此，壶山芝水之间初步形成今之镇驻地上、中、底、外四个居民村。

人口、民房的发展带来了良田的开发。玉壶砾筑成后，历代民众在原水流之域除建今之上村部份民房与中村民房之外，接着大开良田，即今之横塘垵、门前垵、下水河三片良

田。中村、上村居民基本上赖此为生。底头、外楼民众在象岗、外楼高地、蛙蟆坑两岸引坑水灌溉大开梯田。清末武举余明瑞于民国初年在东山脚下筑一条长200米、宽3.5米、高4米的大石砾，将砾下十顷山园与沙地开成今之杨村垵。

玉壶的建政在明代已属瑞安县五十都。据《胡氏宗谱》“请立族长示”中载，明弘治十三年（1504），温州文知府准立瑞安县五十都族长。另载由族长制定族规、家规、禁约管理民众。这种制度在玉壶的历史上一直沿袭了四百多年之久。至民国二十年（1931）玉壶始建政为乡，次年改乡为镇。1948年划归文成县，镇名不变。1952年玉壶镇析立为玉壶、吴垵、上林三乡1956年吴垵复并入玉壶乡，1985年9月12日经省民政厅批准改为镇建制，称玉壶镇。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侨胞、侨属、侨眷政策的落实，政府对侨乡建设的高度重视，海外

赤子对自己乡梓的热情支持，玉壶镇大大变样了，出现崭新的面貌，欣喜的玉壶人把这些变化概括为：“看地面绿水青山，看路面四通八达，看街面广厦千间，看店面满目琳琅，看帐面收入翻番，看人面喜气洋洋。”1988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223.8万元，比1980年增长57.8%，农民人均收入达271元。乡镇企业崛起，商业发展较快。现有农机厂、五金厂、翻砂铸件厂、雕刻厂、纸厂、碗厂、自来水厂、酒厂、煤球厂、服装厂、雨衣厂、食品加工厂各一。1988年工业总产值52.4万元，比1980年增长2.1倍，据《瑞安县志》载：民国二十年，玉壶街有店屋50座、商业76户，可见当时商业颇繁荣。今有个体商业160多户，加上天妃宫市场与六处供销门市部，市场上供应物资较丰富，商业越发繁荣兴旺。

八十年代开创了玉壶建房的历史新纪元。继建壶山路后，1986年3月经县城建部门规划拆建了塘下街，创办了天妃宫市场，新建了冰心街、玉泉街、芝水街，并规划新建迎春路。这些新建拆建的街，长分别为150米至

750米，宽11米至20米，楼房高三至五层，总计新建楼房一千余间。1988年又将壶山路、冰心街、天妃巷、玉壶街、外楼路、塘下街铺设了水泥路面，计一万九千多平方米，市容壮观。

民国之前，玉壶交通极为不便。去东背、朱雅、李林等地需用船渡过蒲坑口这段芝水；去吕溪、东头、金星等地需步过砾头碇步；去上林、营前等地需涉过蛙蟆坑，渡过头渡水，每逢雨季，常有事故发生。同治三年（1864），有一新官僧在蒲坑口处首建石板桥，光绪七年（1881）有山贝周瑞田再建，民国八年经胡希九三建而成（后经过修理），今之蒲坑口桥（又名芝泉桥）。砾头桥由胡嘉典变卖家产筑于光绪25年（1899），高桥（蛙蟆坑桥）筑于清代。于民国初年在老鹰潭处开凿了一条石筑的路（通往上林），至此，玉壶民众出入始较方便。解放后，交通事业发展很快。1972年文（成）玉（壶）公路通车，1982年每日又增添温（州）玉（壶）客运车一班，1983年又动工修筑玉（壶）青（田）公路（该线今已通车到

李林乡)，1986年玉（壶）东（头）的公路筑成，又增添了砾头一座长100米阔8米的钢筋水泥公路桥。除此之外，芝溪尚可供筏运，水陆交通比较方便。

农田水利建设速度快，能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了保护“寨下野”与“西江”的耕地，大跃进年头与七十年代在芝溪两岸分别修筑了两条计千米长的拦水坝。1958年在漈门坑拦坝造电站，1984年又建成了3.5万伏的高压输电变电所，两处并网后，保证了全区人民生产、生活之需要，

教育上，清代之前以家庭私塾为主。据《胡氏宗谱》载：乾隆三十一年（1767）玉壶有“林宣映冰书院”（今冰心街84号至100号），道光五年（1825）有“玉壶书社”。据《瑞安县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庠生余钟麟等在店楼墩宗祠首创了“玉壶两等小学堂”。后几经周折于1948年将学校迁至“玉泉寺”（玉壶区中心小学的前身）。现区小有新建校舍5座、教室20个、有学生970多名，教师45位。1958年又增办了玉壶中学，现

有中学生近1100名，教师62位。全镇有幼儿园4所，托幼人数320名，教师10位，成为全区的文化中心。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几名个体中医师，现有区属卫生院、镇属诊所各一，计医务人员40多人，并有5处个体药铺。

解放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在党的侨务政策指引下，侨胞猛增，成为全省著名的侨乡。据1984年统计，全镇境内有侨眷450户、侨胞1100多；1987年按镇驻地四个村统计有侨眷500户、侨胞1400多；最近统计有侨眷550户、侨胞1700多（均含国外出生数）。他们分布在意、法、荷、美、日等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为国家挣来了大量的外汇。据1984年统计，侨汇超出百万大关。近年来国外侨胞往返频繁，外币、外汇无法统计。爱国侨胞热情支援家乡建设，1972年他们集资七万六千五百多元建造了“玉壶华侨影剧院”；1982年归侨胡遇彩独资建造了别具一格的“日月亭”1988年胡志光捐资三万二千元为侨乡添置了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的设备；1988年，当地群众

和华侨集资了10万元，占总投资的50%，建成了自来水厂，使5000多人用上了自来水。1986年，成立了玉壶归侨联合会，开展了为侨胞服务工作。著名侨乡，名不虚传。

展望未来，一个新兴的侨乡建制镇，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将越发走向繁荣富强。



畬 乡 风 情

钟 维 发

畬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十五世纪以后，畬族陆续从粤、闽两省迁徙来文成，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现我县畬族有一万多人，遍布全县七区一镇46个乡200多个村。

畬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在他们自己的交往中都讲畬族语，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通用汉文。畬族又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爱唱山歌，其风俗习惯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现将部分风俗习惯加以整理，供共同鉴赏。

一、相 爱

畬族青年男女在古代婚姻是比较自由的，往往是小娘先追求小郎。他们在共同的劳动或生活中，先用山歌（情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达到互相爱慕之后，姑娘便悄悄地精心绣织彩带。姑娘绣织好彩带随身带一段时间，在

偶然的机会里，悄悄地把彩带抛给相爱的男子。男子也把手镯、银戒子赠送给自己爱慕的姑娘，两人又要进行一番对歌，互相诉说自己对对方永远相爱，象彩带一样系结在一起。男子将心爱的彩带收藏起来，到了结婚那天，新郎以这条彩带把新娘牵入洞房。此后，男子腰间便大胆地系着彩带上山下田劳动。表示夫妻时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二、欢乐的畲族婚礼

畲族人民的婚礼是十分有趣的。结婚的前一天下午，男方向女方送彩礼。两个年轻姑娘穿着民族服装，手提彩灯，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行郎和三个挑彩礼的壮年男子。快到新娘家时，先要放几声鞭炮。当走到新娘家大门口时，大门紧关着，接着再放几声鞭炮，大门内也接应放鞭炮，并神秘地从门缝里往外瞧，如此取乐约10多分钟，这时送彩礼的人必须从门缝里塞进两个小红包，大门才开了，让里面的人一齐出来迎接行郎，接彩礼担。接着就是“脱草鞋”，洗洗脚，吃点点心。到了傍晚，接新娘的红桥抬到，照样又是关着大门放鞭

炮，热闹一番。晚上嫁女酒宴正式开始，酒席间，唱起悦耳的山歌来劝酒了。新娘头戴民族装束，身穿民族服装，双手捧着一个竹制的米筛，米筛里放着一副银镯，点着一对红蜡烛，来到桌前行个礼，把米筛往桌上一放，陪伴的女歌手就唱起了《劝酒歌》“双喜临门两家庭，男娶女嫁结成亲；新娘劝酒古人礼，六亲吃酒笑盈盈”。客人们都把准备好的小红包往米筛里放。一会儿，新娘家的兄弟姐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劝一次酒，主人更热心了，一次又一次捧着斗大的锡壶给客人加酒。整个酒宴洋溢着欢乐团结的气氛。

酒席接近尾声时，长夜对歌开场，几声山歌一响，酒桌被搬走，中堂就成了歌场，男方的“行郎”和女方请来的歌手对歌，好象电影中的刘三姐那样“歌成河”，“歌满箩”，从《度亲歌》到《嫁女歌》，从《红轿歌》到《催亲歌》，一直唱到天亮为止。新娘起身之前，还有“告别爹娘”、“溜筷子”，“衔千斤饭”、“姐妹点灯相送”等仪式。红轿抬动时，姐妹们还要拖住轿杠，以表示挽留。

到了男方就比较简单：当新娘快要来到婆家时。便在厅堂中摆着两张桌，桌上放着两面竹制米筛，每面米筛里点着一对红蜡烛。一面米筛里放着一付手镯，银耳环；另一面米筛里放着银项链，前来道喜恭贺的亲戚朋友和各位来宾都站在厅堂等候新娘的来到。

鞭炮一响，红轿抬到婆家门口、在等候的一些妇女，把准备好的米花苞谷洒向红轿，然后由两名“接姑”把新娘迎进厅堂，再请出新郎，让一位老辈人念念有词地拜天地、祝福新娘新郎百年好合，美满幸福等。两名“接姑”分别将放着首饰的米筛端到新郎新娘面前，新郎把手镯戴到新娘手上，此时，鼓乐声齐响，鞭炮齐鸣，酒宴开始。接着由长辈劝新娘新郎喝酒，一劝新娘新郎喝一杯夫妻美满幸福酒；二劝新娘新郎喝一杯孝敬长辈的道德酒；三劝新娘新郎喝一杯邻里和睦相处风格酒。宴请到中期，新娘新郎提壶端杯给上辈和前来贺喜的客人行礼敬酒。酒宴接近尾声时，新娘新郎用盆端着一只炖熟的全鸡到娘舅的桌前行个礼，把盛鸡的盆往桌上一放，并向娘舅及同桌亲戚敬

酒三次，娘舅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红包往盆上一放，新娘新郎才把盛鸡的盆端走。

全鸡端走后，便接连放三只大鞭炮或放铳，表示酒宴结束。晚上接着便是男女双方歌手山歌对唱，午夜二时左右，才举行送洞房，尔后歌手们继续唱山歌到黎明。

三、畚民主要节日

古历三月初三日，是畚族人民祭祖的传统节日。据传畚族始祖盘瓠为了部下的安居乐业，不受兽害的袭击，日夜守在山上除兽害，专门以山芋为食，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除掉了不少兽害。就在三月三的那天，盘瓠在追猪时不幸殉身。所以一代代相传，在三月三这天，各畚族村寨都要举行祭祖、吃山芋头饭。这一天，男女老少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聚在一起对歌，歌颂始祖盘瓠的功绩。人人都会唱畚族史歌《盘瓠歌》，山歌从早晨一直唱到日落散场回去。各村寨到了深夜里挂出盘瓠图象进行祭祖，以一个化装成道士、头戴神额，身穿神裙，手执灵刀、龙角的人跳起祭祖舞、祭祖时紧闭房门、不许外人看，如有外

人偷看，那是对畬族风俗最大的不尊重，必须受到惩罚。罚跪在始祖盘瓠图象前敬酒。

四、节日登高

畬族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最引人入胜的是登山，每逢春暖花开的“三月三”和秋高气爽的“九月九”，以及分龙节（夏至过后交辰日），在畬族山区都要举行登山活动。登山分群众登山活动和登山比赛两段进行。比赛点选在畬族聚居的海拔600米以上的高山上。届时不限地域，不分男女，连过路的畬族客人都可参加。天不亮，人们就穿起艳丽的民族服装来到登山的起点地，待太阳升起，只听一声鸟枪响，比赛的人群就如箭出弦一样争先向高山攀登，最先到达指定点的为优胜者，受到大家的赞慕，获得锦旗。等到参加者都登上山后，一场有趣的盘歌会就开始了。歌声此起彼伏，歌手们各显身手，气氛十分热烈。

抗日时期的大岙合作社

金士盈

大岙合作社，原系瑞安县西区大岙镇运销消费合作社的简称，成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

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间，瑞安县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办合作社的高潮。二十八年，大岙镇农民亦自要求组办合作社，瑞安县政府即派建设科合作指导员郑树藩来岙指导筹办。先是选择大岙各地热心人士十多人，为筹备委员，分头向群众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并动员各村农民入股。每户户长，只要认缴一股股金贰角（也可认五股），填了入社志愿书，即成为正式社员。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入社社员即达三百人（后陆续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

合作社筹办工作进展迅速顺利，就于八月的一个星期日，借群益小学（现在县小），召

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社章外，选出了陈体松、王志东、刘树松、王之道、吴来沸、郑松年、赵申甫、吴晋绰、金士盈等九人为理事；郑存厚、陈则中、吴信吕等三人为监事，组成理监事会。照社章规定，社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理监事会半年开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开。后为了方便，把一千二百社员，依地段分成十五至二十人为一组，由组长出席社员代表大会。

在第一次理事会上，推选陈体松为社长，负责社务；王志东为经理，负责业务。王志东上任后选任陈志杰为会计，王志祥为司账，金士盈为出纳，王长治，陈永璇为营业员，刘方如为炊事员。后为了采销方便，在瑞安西门外的大岙公所设立采销处，聘任蔡子声为主任。采销处还雇用出栈一人，负责送货事宜。当时租来郑振发洋房（现县机关招待所）为社址，后迁桥头殿，并向瑞安县合作金库贷来五千元钞票作为流动资金，金库为了保证资金不被移用，挪用，特派谢良侠等二人驻大岙合作社监督金融收支情况。当年九月一日，正式开业。当时业务分运销、消费二部：运销即把

大岙的土特产，如糯米，晚米，柏油（皮油，青油）等收购后，运往瑞安城关销售；消费即把社员必需品，如大米、黄豆、食盐、茶油、煤油、油烛、化肥等从外地购来，供应社员（油烛是自制）。当时黄豆是紧销品，大岙又无出产，均由陈体松，王志东二人，亲自到处州（丽水）采购。那时无车运，只能以雇木船及竹筏辗转运抵大岙，运输相当艰难。

当时向合作社销售和购买货物，均须社员证，非合作社社员不与交易。由于经营得法，社内出售货物，均较市场便宜，业务蒸蒸日上，第二年冬，大岙合作社纯益就达二千多元，作社员分红的资金。当时分红是根据社员的总交易额与股息相结合的办法。第三年又把合作金库贷款全部还清。合作社声誉与日俱增，当时省建设厅及瑞安县政府认为大岙是个贫困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办起这样的合作社，诚非易事。故多次给予嘉奖。在建设厅全省合作社名册上，大岙合作社也名列前茅。

正当大岙合作社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之际，

不幸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发生了停运糯米事件，以致合作社最后关歇。事件经过情况是：民国卅一年冬合作社收购社员糯米二百袋（每袋200斤），计划运往瑞安销售，作第二次分红。当时大岙一部分群众，声称粮食出口，影响粮价上涨，因此予以阻挠，不准出口。糯米堆放过久，就会发霉变质，因此合作社多次向县府请求，给予放行。不料瑞安县县长吕律派人把全部糯米运走，至于米款，分文不付。虽经多次请求发还，均告无效。合作社在这一严重打击下，损失惨重，资金无法周转，连职员工资也无着落，职员先后离退。最后只留王之祥一人，维持了几个月，在民国卅三年（1944）春，即无形闭歇。所有生财用具，解放后移交大岙合作社使用。

大岙合作社经摧残而闭歇，广大社员及理监事职员等均深感惋惜。

抗日时期大岙卷烟业

陈永孚 赵义方

抗日战争初期，浙南、浙西南山区有吸烟习惯的人大都抽旱烟，只有少数人才抽上海产的“老刀”、“哈德门”、“长城”。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浙江沿海地区大都沦敌，日寇严密控制水陆交通，市场上上海烟几濒绝迹，这对不惯吸旱烟的老烟们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尤其省城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迁到浙南、浙西南，烟民队伍骤然扩大，市场对卷烟的需求量猛增。在此供求严重失调的形势下，我县卷烟工业就紧步平阳后尘，勃然兴起。

平阳腾蛟、北港一带，早两年就有手工制卷烟的家庭作坊，产品外销景宁、云和、龙泉。文成第一个手工制作卷烟供应市场的是大岙街王合吉大房的王绍宽，一年，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觉察制作卷烟有利可图，特地去平阳参观学习，并带回两架木制手卷机，几斤烟

丝，几斤盘纸，在家制作试销，生意很好。家住温州原籍龙川乡花园的王体乾也从平阳腾蛟学了制烟技术，在大岙办了个手工小作坊，给产品取名“天女”，蓄意欲与“仙女”（平阳产的卷烟，当时颇有名气）试比高。由于手工制烟的设备、操作都很简单，（只需一架木框，一根铜棒，一张双层牛皮纸）配料容易（烟丝中加些当归、酒、蜂蜜、果汁、龙眼汤），唯一难办的盘纸（进口货）也可以从海门（当时上海走私货的重要中转站）买到，而盈利厚、销路广。大岙、龙川、中堡等地的商人竞相效尤，一时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为了竞争，1942年，郑明恕、王体乾、陈体慎、白锡岩等十余入合股兴办中民烟厂，（厂址在上房赵德泰老屋对面）招女工数十名，手工生产“飞将军”牌卷烟，率先用商标（商标的图案是一个站在飞机旁边整装待发的飞行员）。接着，赵沛罗、王孔鸠、吴巨乡等兴办加义卷烟厂，生产“高射炮”；王绍明、王绍乾、王鸿亨等兴办浙江卷烟厂，生产“明

星”、“西湖”。最后，中堡程稟聪、李家杰等兴办远征军烟厂，生产“远征军”；郑明恕退出中民厂，另与郑明都、郑存厚三人合办三友卷烟厂，生产“大堡垒”。

论规模，五家烟厂以中民厂较大，全盛时期有女工一百余人，还常开夜工，日产量十篓箱左右（每篓箱50条，每条25包）。光统计中民、加义、浙江三厂，日产量就有25篓箱左右（家庭作坊生产的就无法统计了）。产品除了满足本地需要外，还大量远销福建浦城、寿宁和省内庆元，龙泉、云和、景宁、青田等县，中民厂还派白锡岩在龙泉设立分销处。连在温州、瑞安一带的烟店，柜框里也常出现“飞将军”之类的大出烟。销势最佳的是“飞将军”，烟民们反映，“飞将军”的质量，还胜过平阳北港烟厂生产的卷烟。

1944年，中民、加义、浙江三厂先后增置进口的卷烟机。这种卷烟机体积不大，只需一个人操作，能完成“打印”，“上烟丝”，“上糊”，“烘干”，“截切”五道工序，效率高，枝条整齐，自然产品也就更受消费者的

欢迎了。

五家烟厂之间的竞争激烈。不必说在组织原料上、在销售地域上展开竞争，光看他们产品的牌名与商标图案也就了解了。“高射炮”要打下“飞将军”、“大堡垒”要“飞将军”无所作为，“远征军”要替代“飞将军”显露锋芒，“明星”、“西湖”看似超脱，实则要以雅胜俗。中民厂还因“高射炮”的商标图案中有一架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与加义厂发生龃龉呢！

抗战胜利，交通很快恢复正常，上海产的“大都会”、“一字牌”、“OK”以及美国烟“骆驼”源源涌入浙南、浙西南山区。这些烟无论从装璜或烟味都压倒文成产的各种牌子，于是文成卷烟工业受到很大的冲击，销售量急剧减少，幸好平日声誉尚佳，价格较低，在山区乡村中仍有一定市场，所以几家较大的烟厂在解放战争期中，仍能继续维持生产。1948年，因为形势紧张，部分股东抽回资金，避居温州，这些厂才一蹶不振。1949年5月，李延年兵团残部南撤，部分经过大岙，兵士们

手持银元敲店门买烟。赵沛罗烟店不得已开了一爿门，以每条烟一枚银元的价格出售“高射炮”，竟售完全部存货，得1300余元。远征军厂门市部设在新六房，店主适因事返中堡，邻居赵寿来以为良机不可失，就代店主打开店门，结果也把全部存货售空，得银元300枚。其他烟店也售完自家的存货。这批败兵就成了文成烟厂最后一批的外地顾客了。

解放后，中民、加义、浙江三厂的进口卷烟机都被温州小桃源烟厂买去，文成又是上海烟、宁波烟的天下了。可是这段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浙南卷烟生产基地的光荣历史，人们不会很快遗忘，不相信？请看，1970年，温州市土产公司筹建瓯江卷烟厂，负责筹建工作的领导同志就没有忘记文成这段光荣历史，特意抽调曾在文成办烟厂富有经验的当时在温州二中任教的王鸿亨先生参与筹建工作。后来由于原料等原因，温州烟厂始终没有办成。

我县第一台动力机器

赵义方

一九四一年四月，瑞安、温州相继沦陷，在温州经商的王体乾先生回龙川花园老家避乱。他见到大岙附近的松木都作柴火烧，于是会同赵寿来，程良俦、蔡碎狗和林店尾的廷七等五人合股创办刨片厂，专产制火柴盒子的木片。他们到温州买来一台德国造十二匹马力的立式柴油机，两台刨片机，两台划线机，一台切边机。当年文成人还不会操作机器；6名工人都是从温州，金华等地请来的。五名股东都参与生产管理，王任经理，赵是副经理，专管生产，程是会计，廷七是出纳，碎狗管生活，于一九四二年春节后正式开工。这是我县第一家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当年人们对机器叫“马达”，也有人称作“引擎”。厂址在现粮食局仓库的旧址（陈氏宗祠）。当年大岙街十分寂静，机器一响，四围山顶也能听到。开头几天，围观的人真不少。一些挑木料的农民都捡些边角料带回给家人看。特别是那根一尺长的圆木

心子，可制刀柄或小轮子，孩子们常拿去做玩具。两台刨片机一天要耗木料一万五千斤，且取材严格，都是十六公分以上的木料，特别大的也装不上。发现一个小节就不能用。半年后，附近的木料就用的差不多了，要到黄坦、大会等地去买，据说提供木料最多的是里阳。每天要一百个劳力挑木料。产品是由温州的贩子转销上海的，开头产品供不应求，售价很高，后来中间商压价收购，上海是沦陷区，无法去直接找用户，物价又不稳定，使工厂发生亏损，然而温州、丽水两地的刨片厂都很兴旺，因瓯江两岸松木多，那边的松木是可以综合利用的，提供刨片用的短料是作副产品处理的，水上运输费用又低，故温州刨片厂原材料的收购价反比文成低。王体乾先生热衷于卷烟业，无力顾及刨片厂的推销业务。他们勉强维持了一年半，无力扭转亏损局面，只好停产。全部设备由温州人买去。这个厂虽然寿命不长，却是我县第一个机器生产的工厂，它的意义是大的，同时也为我县培养了第一批技工。

龙溪梅熟话退兵

赵 祝 炎

1949年，南风刚刚吹熟龙溪两岸的杏梅，蒋军李延年兵团第二股败兵顶着南风从杭州退下来。那时电讯中断，消息不通，等龙川一般群众知道，他们已冲过南田民兵的伏击圈，止宿于黄岭乡的新亭、碎垄、笊篱垄距龙川仅十公里。据传，这股退兵至少有三千人。对于从没见过如此众多大兵的龙川人，这已构成莫大的心理威胁，何况大家了解青景丽中心县委武装队主力早已开赴温州，留驻文成的人数很少。而各村民兵却在党总支领导下匆匆赶往鲤鱼上滩一列山岗上堵截。鲤鱼上滩隔一道较阔而高低不平的谷地与碎垄、笊篱垄、三公阳、黄曲岭对峙。可是任凭这边民兵不断喊话，土铳不断轰响，那边却不理睬，兀自布岗设哨，搜刮粮食，安锅造饭，宿营歇息。

这股败兵毕竟是国民党正规军，败而未

溃，无论行军、作战、宿营，均甚剽悍、诡诈。第二天，农历五月初一，他们的尖兵排在机枪掩护下，冲过三公田、黄曲岭，进击鲤鱼上滩。得手以后，他们又倾巢而出，乘势东向，攻占汤夫人殿背的制高点，然后象一群捅了窝的黄蜂漫下龙川。龙川群众刚发现汤夫人殿上的山岗有十来个影子，尚未弄清是民兵还是蒋军，万松岭、桥岩岭、吊埕岭上的枪声就搅乱了龙溪两岸和平安宁的生活秩序。人们惊惶失措，向溪南一列山上逃奔，可是腿最长的人还没有跑到三甲或凉山，而他们的尖兵排却涉过龙溪，挨次占领了四面山后荏干制高点。接着，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在龙溪上空回荡，四处的散兵很快会集岩潭蓬，合成一路纵队，沿三甲岭向周垌山攀登。躲在山上的人看得清楚，一共只两千多，中间还有少许家属和徒手的兵。他们这一下显出疲劳不堪的模样了，耷拉着头，慢吞吞地走。这天晚上，他们就在周垌宿营。周垌今属金炉乡，旧属龙川乡，地处凤溪与龙溪之间的高山上，地势与新亭、碎垄一样险要，居高临下，可控范围甚大，再加戒备森严，

所有路口高地都设有岗哨，武装队、民兵没有能量夜袭或合围。初二拂晓，山雾未消，他们又向珊溪方面窜去。

虽然这股退兵惶惶过龙川，来不及烧房子，抢物资，屠牲畜（在周垵杀了一头猪），甚至屋前屋后的黄梅也没摘些解渴，但凶残的本性依然暴露无遗，一天之中，共计杀害了三人，枪伤了一人，拉夫五人。

第一个遇害的是赵贤经，中年农民，上村人。他代中下村赵钦政走亲戚回来，不幸在鲤鱼上滩遇到蒋军，当场被枪杀。

第二个遇害的叫赵绍裘，中年农民，中上村人。他是参加鲤鱼上滩作战的民兵。据与他搭组的民兵赵日风面告：蒋军尖兵排向鲤鱼上滩压过来，赵绍裘还放了最后一铳，才和他一起撤。由于蒋军行动快，他们只好躲在黄狗搬窠上面一块大穹岩下。哪料事有意外，偏有几个兵在岩背上放哨，咿哩哇啦的话声传到他们耳朵来。他们以为情况严重，不能久留，决定趁敌人不备，一起冲出，沿山坡滑下去。结果，赵日风冲出来，滑下黄狗搬窠，回头却不

见赵绍裘。以后才知道绍裘牺牲在距穹岩一丈之遥的狼衣丛里。赵日风推测，赵绍裘那次没有冲出，是第二次冲时中弹的，因为他在从黄狗搬窠到洞坑的路上曾听到那儿有枪声。

第三个叫赵贤访，中下村人。是个黄胖病的老病号。蒋军冲到龙溪滩边，他还在马岙坑口一丘田里，正要攀上田坎，被一枪打死。

受伤的赵玉松。中上村人。他跑上田端，开头躺在庄稼地上，后来听枪声沉寂，以为蒋军已去，便站起来走到地边察看动静。谁料桥岩那面转出一个兵，朝他后背开枪，子弹从他左肩擦过，冲击力竟把他推下两条坎。幸好没有伤筋骨，后治愈，只不过永远留下一条长10公分宽2公分的弹疤。被劫走的有过山村赵德洪、上村林良松、赵玉官、下村赵忠环和赵××。除赵德洪、赵忠环一去不复返至今生死不明外，林良松、赵××初三早上便逃回。林良松说：“那晚，我被关在周垵一家楼上。初二一早，我悄悄爬上天花板伏着，幸好他们乱哄哄地集合了，来不及细细搜寻，光骂几声娘便走了。”至于赵玉官则到福建才逃回。

此外,还有两人被逼到水里,险些丧生。上村妇女赵二奶抱了刚周岁的女孩跑到马岙坑口,便听见一个士兵的吆喝声。她慌了神,迷迷糊糊沿坑逃奔,但到了“红沙井”(面积不大而深约四米的潭),那兵已在背后。那家伙端着枪,步步进逼,直把母女俩逼下“红沙井”。赵二奶不会游泳,光作本能挣扎。大概那兵认为不需补枪,也就走了。真是吉人天相,赵二奶虽喝了不少水,终于挣扎到潭边站住了脚;女孩呢,不知怎的也浮到她身边来,被她一把抓住。两条命就这样给捡回来,不过那女孩从此添了一个外号,叫“红沙井”。

至于那夜在山借宿挨饿的人就太多了,倒是那些躲在家里的老公公老婆婆沾便宜,吃饱睡稳,又免受半天奔波,一夜餐风饮露之苦。

当然,这股退兵也付出很大代价。由于武装队尾追和民兵拦阻,那天,他们的有效行程不到二十公里,并且丢下三具尸体(都是攻占汤夫人殿上的制高点时被击毙的),据云,其中一具胖乎乎的,可能还是个军官。也有四个徒手的掉队士兵向民兵投降。总支书记陈成合

把他们暂时安置在外房祠堂，供吃喝。这几个兵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对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似不生疏，情绪正常，吃喝之余，只问这儿是安徽什么县。大概他们是安徽人，盼望离家近一点，好早日回家。

龙溪之畔这阵黑色的风暴就这样突如其来，倏然而去，然而人们至今忘记不得，尤其每当南风熟了杏梅的季节，凡亲身经历而至今白发苍苍的老人，常常会触景生情，共话一番。

闲话电话

赵义方

在县城大岙镇建设路县人民政府对面，目前正在兴建一座六层高的大厦——邮电大楼。计划该大楼建成后，我县即安装自动电话。那时，通话就方便多了。但是，五十年前，电话在我们文成这个地区，确实还是十分希罕的东西。

1937年，我的家乡中堡第一次装上了电话。中堡地处瑞安县最西隅，和当时属于青田的黄坦和属于泰顺的稽垟交界。在这样偏僻的山乡都装了电话，估计当时瑞安县电话的分布是相当普遍的了。当时，架电话线杆的工人都不是文成本县人，他们身背麻绳、铁钩、踏板，全副武装，在老百姓的眼里，又神气又新奇，小孩们跟在他们后面转，都叫他们“电话兵”，一方面捡拾那些短短的电话线（铝丝）头。老人们更是可笑，中堡有个叫李正堤的老

人说：“电话就是《五公经》里讲的白头颈蚯蚓。白头颈蚯蚓一上山，天下会乱。”少数人也就以为“电话来，世道变”了。

1938年，我在中堡小学读四年级。这一年，中樟乡公所搬到学校来办公。同学们对那架电话机特别感兴趣。当然，我们只能站在窗外看而不能走近去用。那电话机是装在墙壁上的，体积很大，耳机和话筒分开，通话时，必须把耳机拿下放到耳边，再朝那话机发话。有一次，乡长不在，我们几个同学到电话室去偷听，当我拿到耳机时，只听到里面叫“马屿马屿”就被别人抢去了。可见当时别的线路通话，同一条线上也可以听到的。

当时的电话，不单是通讯的工具，也是权力的象征。记得当时中樟乡乡长程××与乡绅李××不和，互相争权。程乡长向瑞安县政府提出辞职，批文未下，李××就仗势把电话机搬到自己家中。群众也就承认：这个乡长当不牢了。

到1947年，在大岙镇新恒丰药店装有一门供民用的电话。有传呼，夜里也可以通话，服

务态度良好。但是，一般老百姓，除非有特别重大事件，是不会去挂电话的。偶尔收到电话传呼，也常常惊恐不已。记得那一年，我受人之托，在夜里给一个瑞安中学读书的学生挂一次电话，当他在寝室里接到传呼通知时，以为家中出了什么大事，他一面去接电话，另一方面立刻交代同学们帮他整理行装，打算赶回家。结果当然是空惊一场。

1948年，曾有支电话线路测量队自景宁到瑞安，经过文成，沿途都做了记号，插上旗子。但未见开工。

1949年，为解放战争需要，民兵们把大岙镇以外的电话全部剪断，直到1951年4月，省邮电局派工程队安装。同年5月20日，瑞文两县又通上了电话。

漫话“银背”

赵超植

“银背”这一名称，除却上了年纪的人，一般中青年是不理解的。它是抗战后期一个特有的产物，功能类似私人钱庄，有钱人把钱存到“银背”那里，贷款人向“银背”借贷。

大岙，僻处飞云上游，距瑞安、温州各七十里，那时交通阻梗，日本鬼子不敢长驱直入，比较安全。因此远方避乱来岙的人，与日俱增，部份省、县机关与个别大中学校也迁移大岙来，以致人口空前膨胀，市面畸形繁荣，大小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商人为了不失时机扩大营业，急需资金，而大岙又无银行，钱庄之类金融机构；私人有钱的在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产生保值心理，急急要求寻找放息的可靠对象。“银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1946年，大岙镇中洲庙(今二新村)有个叫

陈亮卿，是第一个当“银背”。相继有吴三善、赵东书、王益群、林廷麻、王长松等，其中吴三善、赵东书两人是附近知名的大“银背”，每年过手的现金，数以亿计（法币）。现在，这些人除王益群还健在外，都已不在人世了。

“银背”手里掌握资金，自然成了社会的红人。不管大商小商坐商行商，几乎全与“银背”发生关系，如老六房、新六房、新恒丰、赵道生、赵仁昌等大商号也不能例外。周宅的周日增（商号周增记）就是依靠“银背”搞到资金做生意起家的。至于“银背”自己更可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握行情，囤积垄断紧缺物资，大发其财。赵东书就是因此致富，购置了田园产业，一跃而成为地主的。但也不是所有的“银背”都一帆风顺的。碰到贷户无力偿还赔了本也有可能，周村王长松变卖了田地代偿借款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银背”重视信誉，他们签发的存条（略似今日银行的存单）可以隐蔽地在市场上流通，特别是赌场，经常可见以他们签发的存条作赌资。对贷巨款的户头，他们格外小心谨慎，不轻易贷出。如号称龙川

首富赵公佐，虽家有田租五百石，一次受公阳外甥之托，向吴三善贷一笔约值五六十石田价的巨款也不成，结果请富商赵东升立借据才借到。后来赵公佐的外甥未能如期还贷，赵东升跑了几十趟上门索债的路，几至涉讼，幸得“文化服务社”店东赵钦政出来打园场，由他去吴三善那里出条换回赵东升的条子才了事。

“银背”的存款利息，开始是月利三分，贷款时，第一个月利息内扣，贷方再付给“银背”手续费2%。以后按月付息。后来随着币值高速度的下跌，利率与手续费亦相应提高，贷出月利和手续费有高达30%甚至50%。一般地说，“银背”总是有利可图，吃亏的是存款的人。有些人省吃俭用积蓄一点钱存到“银背”那里放利息，越放越少，叫苦不迭。据说，不少农民年冬卖了一头毛猪放息，第二年冬天取款时只能买回几斤猪肉。不过，这也不能怨“银背”。“银背”对借贷双方还是有方便之处的。所以抗战胜利后“银背”依然存在，直到解放，它才销声匿迹。

李山村百年前禁赌石碑记

胡克苗 胡冠绍

李林乡李山村，住有20多户胡姓人家，以种蕃薯为生，1820年以后，人们开始种植靛青，收入增加。由于劳力不足，向附近村庄雇用长工、短工，开垦荒地，扩大种靛青面积。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多数人发家致富，成为当时的富裕户，雇用的帮工，也越来越多了。

当时，村里赌博成风，有四户人家，不务正业，以赌为生。188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伙同外地来村的工人，在马坪聚众赌博。有个玉壶坳窟来打短工的陈阿友，参加赌博后，输了很多钱，由于无法还债，就以外借钱为由，深夜逃出马坪，在大坳门的树林里上吊自尽。赌徒中有几人认为有机可乘，急速赶往阿友家中，捏造事实，虚报情况，说阿友被李山主人家谋害而死。该主人家是富裕人家，可索赔一千银元。阿友的父母兄弟，不问青红皂白，

不经调查了解，立即发动邻里几百人，持刀枪棍棒，集中在距李山村五里外的林龙村，扬言要到李山村打人命，抢家财。

李山村为了抵抗对方的入侵，一面组织力量自卫，一面呈报瑞安县，要求调解。同时派人到当时的朱雅乡、桂峰乡、枫岭乡、青田的汤垌乡等地，动员亲戚朋友几百人，集中在李山。派专人到青田一带，购买生铁，聘请铁匠，赶制土铳四十多支，土炮两门，自制火药，在交通要道的后坑岭头，开岩搭棚，安装土炮，日夜轮流把守。在试炮时，两门土炮同时发射，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村人以为双方已接上了火，惊恐万分。而对方则害怕土炮厉害，不敢接近。双方对持三年多时间，最后经瑞安县调解，李山村负担安葬费而告结束。而双方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都受极大的损失。

经过这一事件以后，李山村人民认识到赌博的危害性，教训深刻。于是各房族推选一名有威望的长辈，成立禁赌组织，订立禁赌条约，互相监督，共同遵守，违者严惩，报信的有奖。并请石匠刻了一块禁赌石碑，上面镌刻

着：“永禁地方不许开赃放赌”十个字，立在村口大路旁。石碑建于清光绪乙酉年荷月（1885.6）高102公分，阔58公分，厚12公分，迄今已一百零三年了。该村自乙酉年至解放前夕，成为远近闻名的无赌博村，深受人们的赞扬。现村民委员会，仍以此石碑为教材，向村民经常进行传统教育，收到一定的效果。

群策群力建造知识宝库

——筹建伯温图书馆记实

刘久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是知识的渊藪。南田自清末创建南田小学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就重视积蓄书籍。如刘笃斋、刘凤仪等都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南田小学；民国初年曾在浙江省长夏超部下任团长的刘裴侯，跟随部队进杭城时，有人争抢金钱、财物，他却从被洗劫的文澜阁藏书中检回乾隆皇帝御批过的殿版珍本《历代史鉴》送给南田小学，供师生阅读，后来他父子俩在家乡小学任教糊口，人们讥笑他是不爱钱财爱书籍的书呆子；刘松申一生信佛研究佛经，也将自己心爱的佛经典籍赠送给小学图书室。刘敬庵是南田小学的创始人之一，将一生心血全部奉献给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长子刘劲持在其父出殡时买了一部《二十五史》给小学图书室作纪念，还于1948

年秋囑我筹建“敬庵图书馆”，並从南京、上海买来大批书籍，后因战乱，筹建工作半途而废。1949年春，南田小学图书室又增加了一部《丛书集成》。这部《丛书集成》原是抗日战争前夕陈诚购买。当时陈诚委托刘耀东在青田县城筹建一座图书馆，抗战一起，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被炸，原计划出版的“丛书”就此中断。1939年夏，日寇进攻温州，为了保护这部“丛书”，刘耀东派人去青田县城将“丛书”带到南田家中，1948年刘耀东避乱寄住温州；1949年春，南田解放，刘耀东为使“丛书”不受损失，写信叫我将“丛书”从他家中移到南田小学保管。南田小学的不少图书，后被县里有关单位移用，经各方交涉，直至1983年才运回南田，由刘基庙管理委员会收管，暂放南田文昌阁楼上，但已损失不少。文化大革命中南田小学、南田中学的图书，几乎散失殆尽。目前筹建一所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已成为南田人民的迫切要求。

1985年4月，南田中学原任老校长刘际松和校长刘化民商议发动历届毕业校友集资筹

建一所图书馆,迎接南田中学三十周年(1956—1986)校庆。向教委领导汇报后,教委领导认为:“设想很好,但范围可否扩大一点?1987年是南田区小建校八十周年(1907—1987),如两个学校联合筹建一所图书馆,力量可更大,效果会更好”。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并获得南田区委的支持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筹办南田图书馆,于5月22日由刘际松等十五人联名发出筹建南田图书馆的倡议书。9月26日,召开了发起人会议,会上,根据海内外各地乡亲、校友的意见,成立了“伯温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经协商,邀请刘劲持、刘兆祥、刘志邦、富仲超为筹委会名誉主任(后又增加胡立松、赵焕梁),推选刘际松为主任,刘化标、陈旺钗、郭瑞德、刘化民、赵贤堂、刘久持为副主任,聘请一百多名委员。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刘化民为主任,刘久持为副主任,张松梯、刘耀租、刘宝环、刘光松为工作人员。会上,讨论了刘兆祥先生提出的以“伯温”作馆名的建议(在此之前,郭瑞德曾提出以“郁离”作馆名),经反复研讨,

一致通过“伯温图书馆”馆名，由县文化局批准，雕刻了印章，正式开展筹建工作。

在集资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动人的事迹。省人大常委、省参事室主任刘劲持先生，将外甥从台湾寄给他的一百美金，折人民币300元悉数捐献。在昆明工作的刘景远，接倡议书后，分二次寄来150元。台湾的刘兆祥先生，虽已八十高龄，收到倡议书后就向在台湾的亲友宣传，集资1100美金，寄回南田。发起人之一县政协委员刘则宽先生，每月仅有25元生活补助费，他和老伴的生活还得依靠儿子赡养，经济极为困难，可他还是省吃俭用挤出50元捐献给图书馆，並说：“我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馆舍落成，恐难见到，但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南田人民我总要为建馆出点力！”果然，他未能见到馆舍动工，就于1986年秋病逝。南田小学前老校长刘志邦说：“创建南田图书馆，我双手赞成，除自己捐助外，更要动员亲友、学生出钱出力，争取尽早完成！”1986年6月30日晚，南田失火，县政协委员刘久宽家被烧得一无所有，他还亲自送50元给筹委会，大家

劝阻时却说：“虽有困难，但还是要表表自己的心意！”坚持捐资。县政协委员不识字的农民刘洪鸟同志也捐助50元。南田中学王旭明老师，烟瘾很大，为了资助图书馆，决心戒烟，捐款120元。离开南田中学不久，刚从事商业的董君鲁，决心争取捐款第一名，打听到个人捐资最多的是550元，他送来602元，果然名列国内捐资人的榜首。又如县教委主任刘化玉，父子兄弟姐妹七人，都有捐资，其中五人都捐120元。筹委会委员刘松庭是村干部，带头捐献100元，然后动员别人捐款，並随身携带捐助凭证，手续清楚，方便别人。国外捐资，也是人数众多。特别是侨居西德的赵焕梁和林炳勋先生，寄来400马克时，筹委会的成员都不知他是那里人。通过多方了解，才知赵先生是大岙镇第四村人，他回国时，我们拜访了他，探询捐资经过。他说：“我在西德，听人说起南田筹建伯温图书馆，我想文成县就是以大明帝师刘伯温的谥号名命的。作为一个海外赤子——文成人，我怎能不尽点心意呢？于是就动员青田北山区的林炳勋先生也捐助200马克”。

赵先生回西德后，又动员青田大溪的蒋松斋先生等三人给我们图书馆捐款，其中蒋松斋先生一人就捐资2300元，成为个人捐资最多者。动人事例不胜枚举，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得到各单位及个人的资助，总计4万余元，已够建造馆舍之款。

可是，在选择馆址上，又出现了纷纷意见。有的说，忠节公祠地处中、小学二校之中心点，图书馆应设于此。有的说，图书馆应建在风景幽美的地点，方有利于阅读。有的说，既取名伯温图书馆，馆址就应建在诚意伯庙旁，以符名实。有人则认为：选择馆址应从实际出发，分两步走，目前经济困难，可先建在镇中心商业繁华处，楼上藏书阅览，楼下作商店出租，以租金收入供养图书馆，有了资产保证，图书馆才有生命力，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将来经济好转，条件具备时，再在风景清幽的诚意伯庙附近，建造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古色古香的楼阁式馆舍，将乡贤的珍贵著作、故乡的出土文物等收藏其中。经筹委会反复讨论研究、征求区、镇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后,大家认为,最后一种方案比较妥善,符合当前实际。

通过筹委会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群众的热情赞助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排除了各种干扰,终于在1987年春伯温图书馆馆址胜利奠基,1988年7月29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一座七间三楼的图书馆巍然屹立在南田镇中心牌坊坦了。并于1988年8月16日开放阅览室,于1989年元旦正式出借图书。

伯温图书馆如刚破土而出的幼苗,祝愿它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为两个文明建设、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黄坦王宅天主教

邢碎平

黄坦邢宅地方，有一座红门白壁与众不同的西欧式楼房，它就是我县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

天主教是民国五年（1916年），由王宅王忠信、朱玉斋二人自青田白岩传入黄坦的。当时白岩天主教司事金丙火先生来王宅组织教会，先借用民房，进行传教活动，宣传“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后司事历更，有翁来庭等相继来黄坦传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在黄坦一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许多苦难深重的乡民，为寻求精神寄托，纷纷加入教会。教友王青图等筹集银元一百元，在邢宅买来旧屋三间及屋边亩许闲地作为教堂和活动场所。

1932年，来了两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加拿大神甫（其名不详，人们称其为金神甫、安神甫），入教人数益增，教徒发展到一百余

人。三间旧屋已无法容纳，于是，两位神甫从国外教会中取得银元四千元，盖起了现存的这座教堂。此屋在当时低矮的古屋丛中，确如鹤立鸡群，分外显眼。

金、安二神甫不通当地方言，只得把传教资料译成中文，由教友邢永强翻成土话传授。在传教期间，颇通医术的安神甫一则为弘扬天主之“博爱”精神，二则为笼络人心，从外国带来药品，免费为群众治病。凡患疮疤烂疔者，求之必治，治亦见效。对穷苦的人，还施舍衣物。因而颇得民心。

1935年，安神甫因病回国，由黄胜白（丽水碧湖人）神甫来与金神甫共同主持教务。1936年，黄神甫创办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其经费来自丽水教区。有学生百余人（皆免费），聘请张雄、张碎娟（雅梅）、王体荣、王文光（王宅人）为教师，每月薪金十二个银元。已婚者加四元，生子女的，还有津贴，待遇比其它小学高。教授的课本与其它小学无异，唯学生要参加“早课”“晚课”（做祷告），星期日要做“礼拜”，但来与不来任

其自由。此校未经在当时政府立案。后抗战暴发，经费来源断绝，即告停办。金神甫也同时回加拿大去。黄神甫主持到1947年回丽水，教会遂散。

1985年，瑞安陈神甫（系老教友）来黄坦召集尚存的数十名教友，进行教务活动。此后陈神甫每年来一二次，每次仅讲道一日即分散，没有恢复教会。

傲雪斗霜 迎来春色满园

——记华侨世家胡志光一家

余序整

荷兰华侨总会会长胡志光先生的父亲胡克木老先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就飘洋过海，侨居国外，至今已有五十余载。现在他家二十余人定居海外，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胡志光先生关心公益事业，热心侨务工作，为人民所称颂。兹将其父子事业概况，简介如下。

一、长夜难明赤县天，海外孤子苦连连

胡克木老先生1908年农历11月28诞生于今玉壶区东背乡东樟村（1979年12月23病逝），时值清末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之际，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胡老先生一家十二口，住着三间矮小的平房，靠着几丘薄田，几块贫瘠的山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七岁丧父，无钱上学，以放牧牛

羊为生计，十七岁始学木工。为了摆脱困境，找寻出路，于1931年只身漂泊到新加坡谋生。

胡先生有一双勤快的手，一身木工好技艺，抵新后，即投入紧张的木工生涯。他做的木工家俱比一般人美观精巧，因此易于推销，在新加坡苦斗了七个年头，于1938年才返里与龙背村周旦弟完婚，时年已是31岁。婚后生了长子胡志荣，不久，次子怀孕在身（即志光先生），日益加重的生活担子，逼得克木先生离妻别子，于1941年春，再涉重洋，前往新加坡。

是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不仅祖国的大好河山蹂躏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不久，新加坡也沦陷在日寇手中。海外孤儿失去了祖国的依赖，克木先生在精神和肉体上均受到严重的摧残。

大战期间，国内外音讯断绝，慈母思儿心切，不久谢别了人世，国内亲人生活，陷入了困境。可是善良能干的周旦弟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她上山割柴，下地种菜，耕耘纺织，样样都干，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勉强维

持母子三口苦难的生活，一次将自己纺织的棉布背到青田出卖，突遇山洪暴发，几遭吞噬。这样苦难的生活，直至解放前夕，与克木先生取得联系后，才有所转机。

二、雄鸡一唱天下白，海外赤子乐融融

194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受人欺凌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是年冬，克木先生乐融融地返里为母安厝。此后，往返频繁。胡克木先生一家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随着祖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和侨务政策的落实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康庄大道。特别是在1962年，胡志光先生出国以后，开创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1、合家欢聚。从1962年至1981年，带走家属计12人，全家在海外团聚。

2、事业发展。胡志光先生与其父克木老先生最早于1972年在荷兰乌达累开设了一间向阳酒家。随着事业的发展，人手的增加，志光先生的三弟胡志榜先生于1976年开设了一间向阳酒家分店。1979年，志光先生妹妹胡彩

娟女士开办了一间朝阳百货商店。1981年后，大哥胡志荣先生开设中、西餐馆各一间。1984年冬志光先生还成立了荷兰——玉壶国际贸易公司。一家四兄妹，各自安居乐业，经济富裕，住房宽敞，设备齐全，成为旅荷华侨中的殷实富户。

3、帮助亲友。胡志光先生不仅自己一家在海外安居乐业，而且把恩泽广施给亲友。在他的支助下，出国的人不下八十人，大多数定居荷兰，部份改去法国和意大利。每逢国内亲友发生困难，他们总是慷慨资助。

三、爱国爱乡多贡献，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胡志光先生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办事公正，乐于助人，在旅荷侨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78年，华侨总会改选时，他被大家推选为总会会长，其弟胡志榜为常委。从此，志光先生很大精力化在总会工作和服务侨胞上。今录其大事于后：

一是创办中文学习班。志光先生有鉴于在荷华侨少年一代，洋里生洋里长，不懂祖国文化，就不可能了解祖国、热爱祖国，面对现

实，急需创办中文学习班，以解决侨胞子女学习中文的困难。1978年，华侨总会在中国驻荷代办处的支持下，先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第一所中文班，1979年春又在乌特里基市创办了一所中文班，嗣后，逐步发展到各大城市，至今已有11所中文学习班，就读学员900余人。

二是创办《华侨通讯》。旅荷侨胞，平时很少看到中文报刊。为了对侨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侨胞能及时了解祖国新貌，懂得荷兰法律及丰富文化生活，志光先生提议创办《华侨通讯》，并自告奋勇承担主办人。在志光先生的努力下，《华侨通讯》终于在1977年7月问世了，当时定为月刊。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侨胞的热爱支持，于1984年6月开始改为半月刊。到1989年10月底，已刊出212期，每期发行量从2000份增到6000份。发放面国外有欧洲各国华侨组织和荷兰的各华侨餐馆、商店，国内发至各侨务机构。《华侨通讯》不仅教育了广大侨胞，同时加强了国内外的沟通。

三是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志光先生极为

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不仅动员侨胞在《通讯》上发表文章，还于1982年7月应中央领导廖承志的邀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发言，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外，还受到叶飞副委员长的接见和亲切交谈。

四是增进中荷友谊。胡先生十分注重与居留国增进友谊，为改善中荷关系而出力。每逢国庆佳节，总会都要邀请荷兰政府内阁成员和市长等参加庆祝会并设宴款待。如1983年国庆节，旅荷华侨总会邀请了温州瓯剧团和中央歌舞团部分成员赴荷演出，荷兰政府成员也应邀观看了文娱节目，与侨胞共同欢度国庆。荷兰政府也常请他参加会谈，特别是阿姆斯特丹、乌特里基、鹿特丹等市的市长与志光先生往来尤为频繁。如1980年，志光先生陪同阿姆斯特丹市市长来杭洽谈贸易事务，即是一例。

五是热爱家乡、胡先生爱国之心可嘉，爱乡之情更是可敬。1972年他捐资15880元建造玉壶华侨影剧院；1982年捐资12500元给广播

站，添置电视差转机，最近，资助建造玉泉公园3万元；为玉壶镇建造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资助设备费3万多元；和侨胞胡志敏、周克信先生合资购买一辆小轿车，赠送县侨联。此外，1982年6月，大岙镇遭受火灾，损失惨重，志光先生发动旅荷侨胞，筹集救灾资金18000元，支援灾民，还在多处捐资修路架桥和建造凉亭与公益事业。

从胡克木老先生到胡志光先生及其子女，五十多年来的家史，是一部从旧社会饱受风霜雨露到新中国安居乐业，为国家、为家乡多作贡献的历史。也是我县华侨的楷模之一。

博大的胸怀 高贵的品德

——记蒋文忠先生三五事

吴鸣皋

蒋文忠先生，原名东瑗（1905—1967），玉壶中村人。弟兄七人，先生属老四，读了几年小学后，就到三源一家药铺去当三年学徒，此后做过店员，开过染坊。解放后为土产联营站职工。1962年和1964年曾二度出国，在意大利经商三年余，1965年返国。他的一生，诚实耿直，先人后己，乐善好施，为乡里所称颂。现记述数事于下，以示缅怀。

一、耿直为性，永不忘义

蒋先生初成家时，仅分到一间狭窄旧楼房。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东贷西借凑起一笔资金，开起染坊。染布用的靛青，价格昂贵，自己没有资本大批进货，只得向大岙王合吉四房赊借。王合吉四房是大岙镇著名商家，资本雄厚，生意兴隆，文忠先生曾在他的店中做过

店员，诚实可靠，深受东家信赖，故赊借靛青，一言为定。有一年年终，文忠先生将欠款交人送往大窑，结果退回五十四块银洋，经仔细对账后，发现王家将一笔德国靛青漏记，故多出这笔款。五十四块银洋，在大商店里只不过是另头钱，可对开小染坊的文忠先生来说，却是笔大数目。有的人就认为这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这钱既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老板漏记账目，就是“天赐之福”。可文忠先生并不动心，他说：“做人第一要事是忠诚老实，人穷志不能短，不是自己的钱财，分毫也不能拿”。就在第二天——大年初一，亲自将钱送到大窑。

二、菩萨心肠，救人为怀

1942年间，玉壶镇驻进一营缉私兵，有二个士兵在横山头打狗吃，被群众告发。营长在盛怒之下，召集全营官兵在砾头桥边草地上，宣布二个士兵违犯军纪，予以枪决，并命令勤务员立即执行。围观群众，既惊讶、又焦急，正当危急之际，文忠先生挺身而出，向营长进言：“严明军纪，是老百姓的希望，也是

军队威望所在。但为了打死一条狗，枪毙两条命，在沒有很好的管教下，就处以极刑，实是过严过重，请予减刑。”营长听了文忠先生言词后，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即转口说：

“死罪既免，活刑难逃，打四十军棍，以示惩戒。”事后军纪有所好转。

有一年腊月，文忠先生听说北岸垵官倒着一个重病乞丐，他立即赶到宫里，果然见到一个蓬头垢面，满身脏衣，臭气冲天的乞丐，倒在屋角，奄奄一息，文忠先生见状，心中想到的只是“救命”二字，他不管脏臭，就把乞丐背回家中，请医调理，病愈而去。文忠先生救人生命不分贫富贵贱的博大胸怀，高尚情操，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三、雪中送炭，助人为乐

1935年，瑞安营前有个叫施德昌的皮鞋匠，借住他家，有时生意清淡，家中揭不开锅，文忠先生经常乘施德昌外出之际，偷偷将大米和茹丝装满他家中的米缸，暗中接济，六年时间，接济不断，后来施德昌搬往定海，听说文忠先生患病，还派其弟送来东洋参，还是

恩人长、恩人短的叫个不休。

1952年，文忠先生得知三源药店的东家生活困难，就向工作单位“土产联营站”借来三十万元（相当于900斤稻谷价），亲自送到三源。1962年出国前，又遇见东家在温州治病，医药费尚无着落，他就马上写信嘱咐儿子蒋运帷负担全部医药费用。可是当时家中经济也是十分困难，代付药费还得向人东借西贷。这种急人所急，先人后己的精神，在文忠先生身上处处可见。

四、资友读书，节衣缩食

现在侨居美国的余式修教授是文忠先生的少年朋友，当式修先生考取丽水中学时，因家境清贫，父母不同意他继续上学，在文忠先生的积极支持下，才得完成中学至大学的学业，现在功成名遂，是个著名学者。长子蒋运帷在意大利时，他专程前往拜访，带去重礼，并恳切地说：“这些只是略表心意，不能报答文忠先生对已资助的万分之一”。朱阳乡谈阳岭头的吴天健先生，现在台湾，是个军界名人，是蒋纬国的姻亲。少年时，因家贫缺少

学费和川资，经人介绍，向文忠先生求援，当时文忠先生家庭经济也较困难，但为了鼓励青年人的好学上进，就向别人借贷解决了吴的经费难关，完成了学业。

文忠先生在世时做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事，当地群众有口皆碑。而今文忠先生子孙昌盛，有七十余人在意、法、荷等西欧国家经营工商业或在校求学。余式修教授曾赠送给他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赞语可谓恰而又当不过了。

三世启蒙 耕耘百载

朱茂海

玉壶区中心小学,由余钟麟老先生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今已达八十周年。八十年来,余老先生祖孙三代为玉壶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余钟麟(学名余嵩岳)老先生,1882年生于玉壶街泰宁店,卒于1955年春,享年七十三。余老先生知识渊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末进秀才。光绪三十三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后,接受新文化思想,顺应历史潮流,立志创办教育,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乡的人们。他在继黄河、朱寮等地执教之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跟学友胡一山在玉壶店楼墩宗祠首创了“玉壶两等小学堂”。于民国元年(1912)余老先生独立在玉壶天妃宫分办了“双穗”初等小学,民国四年(1915)附设高等小学,到民国十六年(1927)

已编五级，有男生103人，女生25人，教员7人。民国二十年（1931）改为玉壶乡中心小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改为玉壶镇中心小学，1950年改为玉壶区中心小学。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民国三十年（1941），余老先生为了办好这所学堂，认真地筛选教师。师资除了聘请本地名儒外，还向外地聘请。如郑降头的郑爱山，川盘山的梁亦中夫妇，营前的苏泽民、黄国祯，马屿的王卫忠，谈阳的周志度，公阳的赵良、秦卿等。生源除本地儿童外，尚有部分来自外乡。

余老先生的办学不是一帆风顺的，下面试举二例。

首先碰到的是经济困难。那时教师的束脩和其他开支，仅来源于学生的学费，经济十分困难。民国十九年（1930），瑞安县教育局叶督学来玉壶视察，余老先生借机以“五十都中玉壶学校经济缺尽实真难办”为内容巧书藏头诗，以示启蒙教育的重要和办学的艰辛。其诗云：

五洲文化推黄种，十字源流肇太西。

都鄙有章怀子产，中流砥柱念班超。
玉不琢磨焉成器，壶因滴漏始知更。
学术阐明为教育，校风进步赖诸生。
经国文章由学术，济民道德在修身。
缺疑学问师文子，尽瘁鞠躬法武侯。
实意育人非图利，真心治校岂为名。
难知唯在功勤奋，办学须当力认真。
……(此诗仅凭记忆，与原文可能有出入)

叶督学看了以后，十分赞赏和感慨，回瑞后即拨款资助。

其二是校长之争。民国二十四年（1935）左右，国民党军队开到玉壶驻扎，人惯称烂头队长的朱积光，偏信其乡绅一面之辞，欲撤余老先生校长之职，达到由某取而代之的目的。

一天早晨，朱队长突然向余老先生发难：限令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一百担泥箕，一百条扁担，一百把锄头，否则……。余老先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邀请了保、甲长，发动群众完成了任务。

朱队长眼看难不倒余老先生，要撤职又

师出无名，于是改变了手法，欲在教学上吹毛求疵。第二天上午，朱队长暗地里站在教室外窃听。由于余老先生博学，讲课形象生动，声似铜钟，象磁石一样吸引住学生，室内静而不哗。朱队长感慨地说：“如此校长，哪能撤职！”一场校长之争以余老先生继任而结束。

余老先生从事启蒙教育四十多年（其中办学三十多年），为培养家乡人材，传播祖国文化，建设社会文明作出了大贡献。

余老先生之子余式忠（学名余勉臣）先生，生于1908年，卒于1974年。民国十三年（1924）起他一直在玉壶乡中心小学执教到解放前夕，一生在教育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四年。

余老先生之孙余序整老师，生于1936年，1957年参加教育工作，1980年到1985年为地区小学语文教学年会会员，1978年起任玉壶区小副教导主任至1988年退休，1987年被聘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冬授于小学高级教师职称。

余序整老师执教三十多年来，坚持教书育

人，虚心好学，善于积累经验。为提高教育质量，身体力行，经常开展全区性教研活动，传授教学方法，为提高在职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师训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今年是余老先生创办玉壶区小八十周年暨其孙余序整老师退休之年，玉壶区小为了表彰余老先生祖孙三代对家乡教育工作作出的贡献，乘余序整老师退休之际，赠送一面“耕耘百载、桃李芬芳”的黑地金字锦匾。在欢送会上，余序整老师赋藏头诗一首表示答谢。其诗曰：

退守寒门腊月天，休将要事忘心田。
芝溪岸上人声沸，天巷门前锣鼓喧。
赠品之尊难比拟，送别隆重更空前。
锦中书法何工整，匾面题词志万年。

钟德章与培头小学

钟维发、钟丙义

钟德章先生，字国光，是位较有名的畲族文人，早年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1909年出生于青田县南田区（现文成县黄坦区）富岙乡培头村。

钟德章先生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岁至十二岁在村私塾读书，后到处州“天主堂”读书（教会办的学校），因家境贫困，家里把田地都卖掉供其读书。处州“天主堂”读毕业后，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后又因经济困难，眼看无法继续学习，其父就到高村兰木才家借来银元贰佰，才得完成学业。毕业后回到培头村办毕业酒。因钟德章个子矮小，体质较差，当时没有当军官，就在地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钟德章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在本村创办崇道小学，后又到处州聘请神父到培头创办天

主堂。办学资金都是从农村助租石谷凑成。当时天主堂和校址是租用培头驮屋钟学秀、钟瑛光两兄弟的两间屋楼。1937年，钟德章先生就在培头坳门山埩上选定校址，这就是现在培头小学的前身。钟德章先生为了尽快地兴建起新校舍，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带领地方民众挖平山埩，修筑道路。他每天拂晓就去学校动工，直到天黑才回去，不到半年时间，两排六个教室和一个门厅基本建成，并启用新教室上课。两排教室之间的山埩和操场还没有挖平，后来发动学生利用体育课和劳动课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培头小学办起来了，钟德章先生也得到了附近各村寨畚汉两族群众的高度赞扬。怎样才能办好学堂？他又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地为培养好人才而努力。他自己担任校长，教师由他聘任，开始是钟志彬和他三弟钟义作三人任教，钟德章先生对师生要求严格，校纪校风较好，教学质量也较高。以后学生逐年增多，教师队伍也不断扩大，除上述三人外，钟志清，蒋学歉、张雄等教师相继到校任教，直到解

放初期改为培岙乡小（现仍称培头小学）。当时教学质量一直名列黄坦区各乡前茅，由于教学质量高，附近几十里路的学生都前来就读。

钟德章先生不仅在本县畲族群众中较有名望，而且还是青田、丽水、云和、景宁、泰顺、平阳等附近县有名的律师。尤其是在畲族人民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畲族山寨如果发生较大的案件纠纷，都要请他前往解决。

钟德章先生还是一位为我地下党作出贡献的民主人士，他过去在许多场合，表面上是为国民党做事，但暗地里做保护共产党员的地下工作，护送我地下党员，作出了贡献。

晚清文举人林绍年

陈 圣 庆

林绍年名国恩字仲钱榜名绍年，生于公元1869年大岙镇苔湖村上林宅，书香门第，卒于1950年，享年80。

林绍年自幼天资聪颖好学，终日孜孜不倦，四书五经皆通。他16岁进学（庠生）就读于瑞安县清光绪太仆卿孙依言先生门下，文思大进。20岁府考得中生员（后补廪），清光绪辛卯（1891）年科乡试，得中举人，是大岙第一位文举人。捷报送到已黄昏，当夜天清月朗，道贺者除左邻右舍外，不远三、四里而来者也不乏其人，一时人头拥挤，热闹非凡。直至夜深始散。次年由其三弟仲麟护送至京（北京）京试，榜揭后，名落孙山而回。至瑞其师孙阅原稿，惊曰：文章可取，为何不中？翌年，孙奉召进京，查阅原试卷，封面书有“字过八百”四字，始悉其因，盖因在瑞安写文章格子每行20

格，京试时稿纸每行22格，因违规落第。孙责其疏忽。后科举废，遂家居。

公元1912年，他为了适应时代潮流，发起创办私立明达小学。择苔湖林氏宗祠为校址，林氏七房养贤田为办学基金，委其四弟国辅负责管理校务。他办学有方，所聘教师均系地方有名之士，因此学校声誉与日俱增。后其弟国辅接任校长，因房族意见分歧，同时师资缺乏，故该校日渐衰落，民国十六年（1927年）停办，后并入群益小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当地连日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孟潭砾被冲决。此砾系大岙西北各乡村来岙必经之道路，同时是保护农田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屏障。1926年林绍年挺身而出，发起筹募重建。在重建期中，他废寝忘食，每日赴工地监工，未尝间断。新砾成，筹款尚亏三百余元，他不顾私人得失，慷慨解囊，全部付清，现尚脍炙人口。

林绍年乐善好施，是大岙慈善单位（育婴堂）首事之一。1921年，送堂女婴众多，无法遣送，他领养一名，以作养女，视同己生，后

适下沙垵陈德盛为偶，现已亡故。

民国十九年（1930）因其为人正直，知民疾苦，大公无私，被村民推选为大岙仁让里里长（当时大岙分仁让里友助里两里），在职时，不受贿赂，公正办事，每逢欠收之年，青黄不接之际，为了救济饥民，组织地方殷户轮流施舍白粥一天，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

广生秤的始创人

赵 祝 炎

凡六十岁以上的文成人，都曾用过或见过至少是听说过广生秤。此秤外表与后来通行的市秤无异，所不同者，一是一斤等于一市斤半，二是一斤为十两。其灵敏度也不亚于市秤，比老式秤强多了。倘若从发明创造的角度去评价，确无甚奥妙，可就社会效益看，自清朝咸丰至民国三十年代。文成一带就普遍使用这种秤，影响可谓大矣！

为什么名为“广生”？始创人为谁？赵氏族谱中有赵琴舫先生在1920年写的《赵朝楠公传》，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述。

“翁字朝楠，号信成，堪舆家鸿文公之仲子也。赋性明敏，度量宽宏，习计然策，善货殖，设肆于大岙街，牌号‘广生’。翁悯市场之弊窦丛生，良由市场秤式不划一，乃创制一

最灵敏之秤，杆不能随人低昂，权衡出入，交易公平。经营数十年，商业盛行，贸易者遂以此秤为标准，率皆仿效之。‘广生’秤之名，几如禹鼎汤盘，留挂人齿颊间也。”

赵琴舫先生是清廩贡生，非生意场中人，对市场弊病，语焉未详。当时文成一带秤式不一，有所谓麻秤、柴秤、廿两秤等，商人还可以延聘制秤工按其意旨自制，有的重五厘（100斤变成105斤）；有的轻五厘（100斤变成95斤）；有的五斤以内重五厘，五斤以上轻五厘。花样百出而外表相同。一般农民既难辨认，又不善算，往往只好听受盘剥。最害人的还是那些“呆”秤，多三斤少五斤，秤杆照样平衡。甚至可用不同的手法，使秤杆随意升降。据四十年代初曾在王合吉四房当过学徒的赵新民君说，他亲眼看过有人称一担空篁箩，重达24斤。大岙本街人吃亏较少，山边人尤其是山底人（旧时称西坑以西以及景宁、寿宁一带的来客），地生人不熟，来大岙做买卖，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赵朝楠身为商人，不随俗沉浮，不见利忘义，始创广生秤，率先应

用，为市场提供公平的衡量工具，推进秤制改革，造福消费者，实在功德无量。

赵朝楠的住址在今大岙镇桥头村。生于清道光壬寅年(1817)，死于光绪己酉年(1885)。他出身堪舆世家，而少壮不克绍箕裘，却设肆经商，始创广生秤，继而办厂炼铁，力图振兴实业，其为人可知。然而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公平正直的商人厂主，以致经商无甚成就。办厂又受到某土豪的觊觎阻扰，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失败告终。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他的壮志消沉，“由是家居，颐养性情，专习地理学，改店号为‘济成堂日馆’”，当起专业的风水先生来。不料这样一改行，时来运转，“人皆仰慕芳名，争相延聘，昕夕无暇晷”，“括山瓯水儿遍行踪”。晚年又鉴于民间使用的历书均来自外地，不无缺错，便与哲嗣廷岷（佐宸）潜心研究天文，根据万年历，结合本县具体情况，自家编历书，父子为此呕心沥血多年，终于编成《济成堂通书》刊行于世，为瑞安以西、青田以南，泰顺以北、景宁以东这一广大地区最受欢迎的一本历书。至此，赵朝楠

不仅经济收入胜过早年经商办厂，而且蜚声四县，俨然是上通天文，下谙地理的名人了。

现在，广生秤已成历史陈迹，《济成堂通书》也为时代洪流冲刷淘汰，可是赵朝楠先生的历史功绩，不应湮灭。他为人民造福的精神，更应值得纪念。



缅怀父亲刘志邦的一生

刘 宝 怀

我父名刘志邦(1899.9.13~1988.5.5)，南田镇新宅村人，兄弟七人，他排行最小。四岁丧父，由祖母抚育成人。11岁入私塾，23岁毕业于上海体育专门学校。经同乡刘少峰先生介绍，在青田县立敬业小学任教七年，1929年寒假回乡，被委任为县立南田区中心小学校长。正月到校任事，原有学生140余人，校舍大部是妙果寺旧宇，系梁木朽腐不堪的危房，危险性大，我父于次年正月召集南田乡一、二两保热心教育的家长会议，决定将妙果寺存款六百元作为改建寺前幢为七间两层楼房，1933年秋落成使用。

1935年9月18日，我祖母八旬寿庆，在校学生朋友祝寿余金120银元，存校作改建寺两轩资金，在家亲戚叔伯祝寿余金30银元，于本村盘谷水口造一座寿萱桥。祝群先生对此有

感，对我父说：“你母寿金作为建校舍资金，实为难得，我父（刘来韶先生）系本校创办校长，我亦将先君阴寿金100元资助！”1937年秋，寺左右两轩各三间楼房四个教室建成。时在校学生骤增至六百上下。

1939年暑期，有绍兴女子戏班来南田演出，区警察向戏班敲杠勒索，南田暑期回乡中学生廿余人组织的服务队得知此事，即乘机在牌坊坦戏台揭发敲杠行为，群众强烈要求将敲杠者严肃处理。夜间群众云集，要求惩办敲杠者，警察开枪，当场打死二人，伤多人。即所谓“八一五”惨案。当时警察惊慌，越墙逃跑，至10里外的言山地方，警察刘库才一脚跌断。区长张兆楠，颠倒是非，诬学生受共党利用，挑动民众捣乱区署，打断警察刘库才的脚，不得已开枪自卫。县长张定邦，不查真相，亲率县大队到南田抓去两个学生——林成槐、何毓槐。学生请律师向高等法院起诉，我父以校长各义据实呈报省教育厅，省府派省督学到南田实地查明，高等法院始判学生无罪。寒假学生回乡，集中南小聚餐言欢，认为此次

胜利与刘校长之努力分不开，即筹集国币4000元，作为建造刘校长当校长十周年纪念碑之用。我父认为不应建造个人纪念碑，决定改作建造大礼堂，并召集地方热心教育的家长二十人组成一万斤谷会，以妙果寺租谷作会倡。发动学生献椽献料。同时还向社会上筹集资金。当时在四川任营长的刘子华闻校长以建碑款作建礼堂事，主动资助国币4000元。南田的一位妇女蒋门刘氏亦乐助国币4000元。嵯县女子剧团来南演出期间，为学校筹款一周，购谷2800斤。为此千方百计，经二年时间的筹备，终于1941年9月13日建成中式三层楼大礼堂。至此，整个寺院全部改建一新。

1940年冬，正当抗日时期，国难深重，南田乡长改选，恰县长翁圣木在南田，说校长乡长可兼任，各保代表即选我父为乡长。一年任期，杜绝一切送礼，秉公办事。当时县府派南田乡地主积谷10万斤，上交八万斤，二万斤留乡机动开支。南田乡有14个保，地主大部集中在一、二两个保。以往乡长是这样分派：一、二两个保四万斤，其余十二个保六万斤。我父

认为这样还不合理，把这个数字对调一下。结果一、二两个保六万斤收齐，其他十二个保仅收二万斤。因八万斤上交任务已完成，其余二万斤就豁免给贫苦民众了。后任乡长刘德隅，因平时与我父善恶心意不同，即诬告我父贪污地主积谷二万斤、寺学租200石等罪名。并多次向青田法院黄推事请酒、行贿，企图合谋陷害。在外省工作的学生吴晋库、周咨諏等闻知此事，无不义愤填膺，认为刘校长一向清廉，热爱教育事业，家境清贫。刘德隅如此欺贫诬陷，破坏南田教育事业，天理不容。他们在南京组织“南田小学学友会”，筹集资金，资助校长与劣绅打官司，前后共寄来关金票二百万元。我父却将此款交总务主任刘久持作为学校图书馆增添书籍之用。

1942年，正当反共严重时刻，青田县长亲临南田清乡，办自新学习班。当时我父亲兼青田县第17区党部书记（南田乡范围）。在此期间，前前后后，曾营救出不少共产党员。如龙川赵雍、下垟李春芬、十源李长春、黄寮金步良、林清洁……。

1949年解放，我县人民政府成立。9月，县长刘日亮委任我父为南田区小校长，并被选为文成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委员。1951年春，我父蒙冤受屈，被判刑15年，1960年提早释放回乡。他的冤案直至1986年才予昭雪平反。他虽身处逆境，可是关心公益事业，维护文物的热忱仍一如既往。如他为修建诚意伯庙、伯温图书馆、盘谷亭费尽心机。千方百计与海外亲友联系，不辞旅途辛苦，亲赴平阳、苍南、瑞安、温州等地筹募资金，搜集族史。直至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要办好伯温图书馆，要求政府追查盗掘石马坟的罪魁。

解放前我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五兄弟五姊妹，仅住祖留的七斗半两层旧楼房，拥挤不堪，确需一座五间整的房子。可我父一心为公，从不考虑家庭私事，新屋未建乐住陋房。正因为如此，大家对我父的评价是：一生清廉，一心为公，高风亮节，为人师表。

施昌东小传

余序整提供

施昌东(1931~1983)，又名昌骥，当代著名美学家、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副研究员、中文系副教授，系浙江文成玉壶镇中村人。出身于贫苦手工业家庭，小年时替人放牛，经常上山打柴，小学毕业后考入减免学费的瑞安县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玉壶中心小学执教一年，于1946年考入瑞安高中部学习。1949年全国解放，在校首批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团干部。1951年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探索美学领域。

大学三年级时，他的第一篇《论美是生活》在《文史哲》上作牵头的显要论文发表，其观点之新颖，理论之深度，不同凡响，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接着他写了《鲁迅美学思想》

近二十万字的书稿以及毕业论文《朱自清论》。嗣后，《文汇报》又特约他写了十篇连载的“谈美”文章。正在他的美学研究初露头角的时候，他的人生旅途却投入了一个又一个阴影。一九五五年毕业前夕，他忽然以“胡风嫌疑分子”而锒铛入狱，平白无故地被关了一年。出狱后，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旋即发表《试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悲剧的艺术特色》、《鲁迅论讽刺》等有独到见解的论文。

一九五七年，他又被打成“右派”。他强抑住心灵的创痛，白天上班，晚上专读马列著作，整整两年时间内细读了列宁全集，做了笔记，为他进一步探讨美学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虽然两年后，“右派”帽子摘掉，但仍然受到歧视。

六十年代初，他从美学理论的研究，再进而研究美学史。为了开垦中国美学处女地，必须具备哲学史方面的丰富知识，所以他除了发表《论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外，同时又与潘富恩合作，发表了《论老子“道”的学说》。

以后,《人民日报》的“学术动态”作了详细的报道。施昌东研究美学,只能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经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写作,肚子饿了,就将冷馒头泡上白开水充饥,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美学论稿》、《先秦诸子美学思想》共一百多万字的初稿。

十年浩劫的“文革”开始,他又作为“死老虎”,挂牌、隔离、游斗,他的书籍被抄去丢进垃圾堆,他冒着风险,偷偷地拾回来藏好,由于他长期精神上受折磨,生活条件差,得了胃溃疡。当“四人帮”临到末日的1976年,施昌东却得了胃癌。动了第一次手术,医师定判他少则活三个月,多则半年,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灿烂光辉照耀下,施昌东在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精神大振,在癌扩散的情况下,却奇迹般地活下来,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首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的探索》达四十万字的专著,畅销国内外,因供不应求而一版再版。施昌东被誉为当代中国美学派的建立者。接着《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评

述》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美学史的先声”，然后又出版了《汉代美学思想述评》。就在这时，他第二次癌症复发，做了胃全部切除手术。开刀以后，他不顾伤痛体弱，继续握笔写作，又完成了一部美学论文集《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与潘富恩合著的《中国哲学论稿》（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生前只看到了后三部书的清样和封面设计，等不及出版问世，便与世长辞。

养病期间，他还以顽强的毅力，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完成那部数十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这部小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施昌东这种顽强与死神搏斗的精神，好几位作者为之写了报告文学。《文汇月刊》的《施昌东的故事》（肖岗撰），《人才》的《在死神魔爪里夺来的桂冠》（倪振良），温籍女作家叶文玲在《报告文学》上为他写了长达二万五千字的《美的探索者》。此外，还有他的老师、著

名文学评论家贾植芳教授也在《文汇报》上为他写了悼念文章。施昌东的事迹，扣动了国内成千上万读者的心弦。

施昌东在与癌症斗争的第七个年头，第三次癌复发。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党组织批准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终年五十二岁。他二十多年来，政治上历尽坎坷，而不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与癌症作斗争的同时，写出七部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典型地表现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

（注：本文摘自施昌东的遗著《一个探索美的人》潘富恩教授为其写的“施昌东小传”一文，略有删增）

记我县名京胡琴师 陈珠妹

吴 亮

陈珠妹先生名叫绍平，珠妹是奶名。大岙镇林店尾人。出生于民国二年（1913）。小学毕业后，学习裁缝手艺。17岁那年，我县玉壶成立了天蟾舞台京剧团。同时向本县招收学员。珠妹先生毅然抛弃裁缝手艺，考入这个剧团。开头，他在前台学演老外，二年后，改到后台做司鼓助手。当时该剧团的京胡琴师叫李大伦，艺技颇高，使珠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又从学司鼓改学操琴，帮助拉拉二胡。由于他天赋高，加以克苦学习，操琴技艺，进步很快。不久，李先生因故离开剧团。主胡这个重任就落到珠妹先生的肩上。这时，他的钻劲更足，常在夜里练琴，为了不影晌别人，他把琴码改用铜板，以此降低声响。他天天要跟班演出，无法去拜名师学习。其实，当时的山区，

附近也没有比他更好的琴师可作为他的指导人。他就买了不少全国名琴师的留声机唱片，放在留声机里播放（当时还没有录放机）。他自己则操琴在旁边跟着学。这方法曾在当时本地的京胡爱好们中流行一时，大家得益不少。珠妹先生更是突出，经他的细心研讨，耐心实践，在指法与弓法上都有独到的创造。成为大家公认的我县当时最好的琴师。

1934年天蟾舞台京剧团改名为“二二京剧团”，与当时的金福连剧团齐名，成为温州地区最有名望的剧团之一。1945年，与温州京剧团合并成联合京剧团。长驻市内东南大戏院演出。原温州剧团的琴师是一位很负盛名的瞎子，合并后，瞎子拉主胡，珠妹先生拉配胡。过了三个月，瞎子自认珠妹先生的琴艺已超过他的水平，并积极向各界推崇，于是声望益高，就在当年，京剧名旦海碧霞自上海来温州献艺，她听了珠妹先生的琴艺，就请他作为自己的二胡琴师。海碧霞在温州期间的每场演出，都要他配琴、而且还请他作为吊嗓练唱时配琴。海返上海时，曾特邀陈去上海担任她的

主胡琴师，但由于当时温州不肯放，未能成行。

珠妹先生醉心于京胡艺技之中，又长期在剧团里工作，操劳过度，身体很差，终于致病不起，于1947年死于林店尾老家。这位我县一代名琴师就这样辞世了。

南田镇的联簪坊

刘久持

旧时牌坊种类甚多：有为表彰孝子的孝子坊；有为赞扬妇女的贞节坊；有为歌颂升平的百岁坊；有记载大臣功绩的忠臣功名坊……。忠臣坊可跨建于大路之中。南田镇有个“联簪坊”，就是为表彰大臣功绩的忠臣坊。

何谓“联簪”？簪字有多种解释，这里是指古时当官的冠饰，用来把冠固在头上。再把意思引伸开来，也就是指当官的。联簪也就是指几个有关系的人都当官。南田镇的联簪坊是为表彰明开国太师刘基和他的儿子谷王府左长史刘璟以及孙子行在刑部照磨刘𧇖祖孙三代的。祖孙三代都当官，而且又都为朝廷干了些好事，确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它是值得南田人也是我县人引为自豪的。

这个牌坊是在明朝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奉旨建造的。全部是木结构，雕刻精

美，很能表现出明代建筑的特色。正反面各写楷书与篆书“联簪”两字。

联簪坊建在南田村中心大路当中。它既是奉旨建造，也为了对刘基子孙的尊敬。文官通过要下轿，武官通过要下马，一般行人通过，也都带着瞻仰肃穆之情。这个联簪坊，确实为南田镇生色不少。可惜的是，这个极有价值的文化遗物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拆除。只有那写有“联簪”字的匾额，被木匠师傅刘景星在拆除时，偷偷地保存起来，现陈列在刘基庙中。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现在，联簪坊虽已拆除，因为建牌坊而得名的地名牌坊坦，却永久地留下来。南田建镇后，这里往东是伯温东路，直达县城大岙；往西是伯温西路，通抵刘基庙；往南是牌坊南路，直通西坑、景宁；向北是牌坊北路，是赴青田的大道。诚可谓四通八达。最近，已有热心人士在筹措资金，打算在牌坊坦重建“联簪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珊溪群众反丁斗争始末

夏叔平

丁振华，原是孙传芳部曹万顺军的一个营长。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军福建，他就背离曹万顺。擅自与郑克礼、王黎洲率部窜入泰顺、平阳两座县城。他把泰顺当作大后方，趁原县长李光白晋省之机。扶植追随他的泰顺士绅潘介为代县长；把平阳当作前哨，亲临坐镇。并勾结瑞、温某些人，梦想扩展势力范围。当上“温州王”。真是官儿不大，野心不小。

一营官兵要吃要喝要发饷。扩展势力要招兵买枪炮。丁振华为了实现他的美梦，除在两县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外。还在邻接泰顺的珊溪一带劫掠、绑架、抽捐派税，搞得飞云江上游两岸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有一天，花竹岭人夏荣秩在百丈听到消息，说丁振华在泰顺的几个亲信携带巨款，正在雇船去温州购买枪枝弹药。他以为丁振华扩大武装力量，将给瑞平泰三县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而且这些款项原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罪，于是连夜赶回花竹岭组织人马，携带土枪土炮，埋伏岔口的渡头地方，准备劫船。第二天，亲信的专船果然顺流而下，他们根本料不到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只顾在船中大吃大喝，猜拳行令，等到岸边鸟枪土铳齐发，喊声震天，才吓得面如土色，抛下不义之财，窜出船舱，落荒而逃。

这一下可算给了丁振华当头一棒，可他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久，竟派郑克礼带领百来名士兵来到方前街，公开扬言要追回银洋，严惩劫船的人。郑克礼还责令花竹岭群众三日之内交出夏荣秩一行，否则，要烧光花竹岭，抢光珊溪、孔龙、李井、方前等地。该怎么对付，夏荣秩他们心中没有底，只好逃之夭夭。不知谁忽而想到朱坑头的朱次玉，花竹岭人便请朱次玉出面周旋。朱次玉在当时的珊溪

附近有很高的威望，又是花竹岭一家的女婿，自然不便推托，就挺身前往与郑克礼面洽。那知刚刚说明来意，就遭扣留吊打，并被勒索去大洋两千。珊溪一带人民本已为此愤愤不平，接着又风闻郑克礼要移兵珊溪街，扩大追查与劫船有关的人与事，便更加恼怒了。有个跛子叫罗阿如的沿街打锣，召集刘、王、夏、罗四大姓会商对策。珊溪一带人民素称勇悍好斗，看不下郑克礼这样妄作非为，于是一个以王步芳、王碎猛、刘间绸、刘际满、夏盛社、夏强谨等为骨干的反丁核心立即形成了。他们又很快串连了花竹岭、朱坑头等地头面人物，把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为了保卫家乡，积极准备以牙还牙，与郑克礼一决雌雄。

不多久，郑克礼真的趾高气扬地带兵移驻珊溪，并且一到就搜夺粮食。可能是他很快从人们的眼神里脸色上嗅到火药味，只住了一宿，便匆忙拉起队伍下船溯流去百丈。这一下珊溪群众看到郑克礼虚弱的本质，再也不放过他了，他们毅然沿溪跟踪追击。开头，还未敢冒然逼近，光在后面呐喊放銃。追到金钟，由

于那儿的溪形迂折，郑克礼的几条船就陷入群众的包围圈，成了瓮中之鳖。群众的土铳打得溪滩乱石横飞，群众的吼声震得金钟地动山摇。经过一小时的激战，船上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怵惶跳永向南岸的山上逃命。但他们刚逃到泰顺横溪，安锅造饭，而珊溪群众已尾追至林坟，残兵在群众的土铳声呐喊声中顿作鸟兽散，结果，郑克礼只带了八个兵向莒江逃去。

莒江人都姓夏，与西山、花竹岭的夏同宗共族，并且也饱受丁振华的苦，现在一看丁部九个官兵被珊溪人迫得掉了魂，灰溜溜地躲入夏氏大宗祠，就把他们捆起来迎接珊溪群众进村。经过商谈，决定战利品留在莒江，九名俘虏由珊溪群众带回处理。后来这九名俘虏（包括郑克礼）被夏荣瑞带到花竹岭处死。

郑连的覆灭，等于砍却丁振华的一条臂膊，可丁振华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扬言要取道水头、晓坑，血洗珊溪，报仇泄恨。这时，龙川人赵标生（安庆武备学校毕业，曾在军中任校官）解甲在瑞安开山货行，听到这个消息，

甚为乡亲担忧。他一面通过私人关系，请准浙南清乡督办公署派驻温省防军进驻平阳，一面赶往珊溪组织群众提防丁部的突然袭击。珊溪群众也豁出命干了，老弱妇幼疏散，粮食牲口转移，青壮年背上武器前往花岭头余司坑等处布防，还在陡坡上搭棚垒石。据说，丁振华果然带兵到过水头，但得知省防军进驻平阳和珊溪群众严阵以待后，才不得不下令转道桥墩，福鼎去泰顺。

省防军进入平阳，又尾追丁振华至泰顺南门外，赵标生也指挥珊溪武装群众经莒江、洪口至泰顺东门外。强大的钳形攻势使丁部军心涣散，发生内哄，开小差的士兵甚多。泰顺城内人民也早就怨恨丁振华，跃跃欲试。丁振华四面楚歌，不敢再呆下去，只好拣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率残部出西门潜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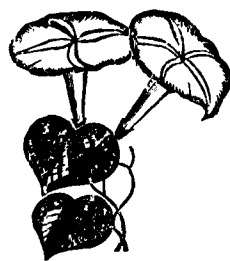
珊溪人民反丁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了！

丁振华的黄粱美梦也如肥皂泡一样迸裂了！

至于丁振华逃返福建以后的情况，珊溪人民便不怎么关心了。不过，去福建做工的人还

是给乡亲们带回一个有关丁振华的消息：据说，丁振华最后无路可走，被福建省长萨镇冰收编了。

（本文根据珊溪八十多岁且当年亲身参战的王奕闹、夏盛球、吴族纳、夏盛提等老人口述整理，并蒙泰顺城关徐志炎老先生赐教。）



桂山乡吴地山战斗史实

包学冠

1935年冬，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同志的领导下，从闽东进入浙南。他们在鼎、平、太边区交界的山垵村（现属桂山乡）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

1936年农历正月初二，村民在太顺中心县委书记周钦民的带领下，从山垵村出发，到平阳吴垵乡岭后村，打开地主林广明的粮仓，把2万多斤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不久又到太顺横坑乡坑头村，镇压了反动地主翁伯政。红军的革命行动，粉碎了当地反动官僚地主的黄粱美梦。他们不甘就此失败，于是，纷纷逃离乡间，并利用“狗腿”组织情报网络，刺探我军情报，向国民党反动派报告。

国民党为了绥靖浙南，便派浙江保安队第三团，进入浙南山区剿共。由杨团长担任总指

挥。3月5日，他们从平阳维新乡出发，进入平阳和太顺交界的山垵地方。我红军60多人，在吴地村的黄坦坑老房东包明山家中。正在吃中饭时，分水村凤门头交通站的包经郎满头大汗跑来报告：“保安队第三团人马已到吴地山下，开始由东垵路上山。”周钦民同志得此情报，马上挑选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小分队，前往阻击，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

我军小分队接受任务以后，在机枪手毛长贤（桂山乡平溪村人，1941年遇难，烈士）和副手包长春（桂山乡双峰村人，曾任新四军团部参谋长，1984年病逝）的带领下，迅速直奔吴地山。他们看到吴地岭头是吴地山的第一峰，左边是牛背坑，右边是桂库坑，中间唯一的小路沿山岗而上，只要卡住这条山路，敌人便无法前进，我部人马便可安全转移。于是他们奋力奔上山峰，把机枪摆在第一峰的高地上。枪口直对山岗小路。下午3时许，国民党第三团果然到了岗下，杨团长骑着高头大马，指挥部下迅速上山。约莫半时光景，先头部队，离我机枪只有百米之遥了，他们正想动

手，毛长贤、包长春等，看请带路的是凤狮村进步农民包学云，便一再忍耐，到了八十米处，包学云迅速转入小路拐弯，毛长贤喊了声“打”！机枪带着“满腔怒火”，“嗒嗒”地“开腔”了。一连串的子弹，打得敌人喊爹叫娘，纷纷滚下山崖，当场毙命的便有三。其中一名是分队长。受伤者数十人。山下的杨团长，被这突如其来来的袭击，气得发了疯，他倚仗人多势众，一边命令开枪迎战，一边拉开包围圈。等到敌人包围到第一峰时，我小分队早已撤离吴地山，安全到达横垵（现仰山乡横垵村）了。

国民党军在吴地山上搜索到傍晚，未见红军半点影子，只得悻悻地直下平溪村歇夜。那三具尸体，他们拦住了上山背小竹（喂牛用）的农民包明绌、包经体等十几位，强迫他们抬尸首。挑运枪弹。到了平溪村时，已近黄昏。杨团长即派人去农民家买棺材，叫包明绌等一同去抬。他们到了毛运连家，说：“买棺材”。毛运连假装不懂，说：“买干菜，到上屋去吧！”反动兵指着放在楼棚上的棺材，定

要买。尽管毛运连哭着说“我老了，我这棺材死也不卖”。可结果还是被抬走了。接着他们又从毛法华和毛荣岸妻那里抬来两具棺材，他们将那三具尸体装棺入殓。安葬在平溪村瓦窑坪山上。他们把那分队长葬在路上，二名兵士葬在路下。杨团长拿出银圆20元，雇当地农民祭扫坟茔，直到现在，三座坟茔尚在。

林 海 春 秋

——国营文成县石垟林场场史

徐 世 槐

一、概况与沿革

国营文成石垟林场，位于县境西部。因为驻地原是石垟乡的辖地，故名石垟林场。全场总面积57平方公里，分设吴垟、干坑、竹苗、新演、水牛塘、廷培、双苗、石角、石展等九个林区和一个上斜行政村（集体所有制），共计31个自然村，人口904人，其中职工456人。

石垟林场建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林场的前身原是石垟公社、下垟公社、南田区黄寮、西湖公社的部分属地。境内有杨顶埭、水牛塘山、白园地山顶等大小山峰87座，其中千米以上的有63座，最低点干演，海拔380米，最高点杨顶埭，海拔1362米，为我县第一高峰。全

境群山起伏，涧壑深邃，溪谷纵横，土壤深厚，土质肥沃。最高气温为摄氏32°，最低为零下12°，年降雨量2020毫米，是我县雨量最多、气温最低、雾日最多、湿度最大的地方。适宜各种树木生长。

三十年来，石垭林场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精神，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巨大成绩。全场现有山林面积80847亩，蓄积量从办场时的5万立方米增加到30.2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90.8%，同时发展了毛竹，现为18.8万株，年采伐木材约3000立方米。林场积极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农、牧、副、工业等各业生产。现有耕地438亩，年产粮食20万斤，现饲养耕牛66头，兴办木材加工厂、麻纺厂、罐头厂、茶厂、食用菌厂。随着生产的发展，交通、邮电、文教、卫生、商业等各项事业亦相应发展。几十年来，该场及场所属各单位几十次被评为县、市、省的先进单位，曾受林业部命名为先进单位，有许多同志还被评为县、市、省劳动模范、优秀党员，选为县、市、省级人

民代表。

石垵林场三十一年，体制上经历过五次大的改革：

（一）石垵林场（1958年7月——1959年4月）

石垵林场于一九五八年七月，由省林业厅批准创办。五十三位职工分散在吴垵、水牛塘、下垵、东家寮四个林区开垦荒山。场部设在吴垵。体制上，石垵林场跟县的分设行政区相当。

（二）西坑公社石垵林场（1959年4月——1960年4月）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当时，原来的区改名公社（后来乡改名“公社”），那时的公社叫“大公社”。由于当时大刮“五风”，便把石垵林场的体制下放，由西坑公社管理，实质上，林场跟当时的管理区（相当于现在一个乡）相仿。

（三）恢复石垵林场（1960年4月——1966年3月）

石垵林场尽管属西坑大公社管理，在行政

上，不过半年。所属时间内，经济上仍然保持独立性。因此，从一九六〇年四月后，又恢复体制。

（四）撤区并场后的石垟林场（1966年4月——1969年4月）

一九六六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开展。温州地委工作队在石垟乡搞点。为了更快地发展场区，便下令以场带队，于是撤销西坑大公社，把原来的西坑、岭后、下垟、吴垟等管理区，绵羊场、叶胜林场都并入石垟林场。这就是“撤区并场”。行政区域，超过原西坑区的范围。石垟林场又从一个乡级单位变为一个区级单位。但体制的变迁，并没有跟经济发展相配套，因为石垟林场在经济上，仍然独立核算。

（五）建区分场后的石垟林场（1969年5月——）

一九六九年，石垟林场成立“革委会”，西坑区也成立“革委会”这样，“撤区并场”成为“建区分场”，行政上，经济上，又跟第一、第三阶段的一样。

二、发展历史

石垭林场建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办场创业、保卫发展、改革前进阶段。

(一) 办场创业(1958.7—1966.4)

(1) 创办林场的历史背景

国营文成石垭林场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创办的。当时,全场有四万多亩荒山,四万多亩未经抚育过的次生林。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必须在群众中作思想动员,并且坚持依靠全社会造林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国营林场的方针。在着重依靠群众造林的同时,必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除原有国营林场应该加强以外,还应该利用国有的和合作社无力经营的荒山荒地,组织下放人力,有计划地增强新的林场。”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石垭林场就在发展四有森林、必须增办新的林场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了。

(2) 创办林场的有利条件

一九五八年春,文成县林业局根据中央关

于积极发展四有森林的指示，便向省林业厅汇报我县石垟、上垟与玉壶的金珠、珊溪、啮口交界的山华等地创办林场的计划。四月十日，县林业局派技术员叶志谦同志到水牛塘实地勘测。廿二日，省林业厅又派二名技术员，由叶志谦带队到吴垟、水牛塘等六个自然村进行办场踏查。五月下旬，省林业厅委托丽水林校师生测量设计。经过三次勘测，技术员与县局领导一致认为，此地具有办场的良好条件：

一是荒山面积广阔。根据设计，周围四万亩荒山与四万亩次生林，可以进行整地造林。在广阔的荒山上进行绿化，创办林场很有前途。

二是立地条件优越。从海拔800米到1300米的高度，可分层次栽种用材林、经济林等；土层厚，腐植质多，土壤潮湿，肥力一般尚好，适合各种林木生长。

三是人烟稀少。根据计算，当时林场范围，每平方公里不到8人，几户人家散居深山冷岙，根本无力改变大面积的荒山，这在客观上，就有创办林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四是办场有一定基础。吴垵，有两间半破屋；水牛塘曾在一九五四年办过高级社、畜牧场，因此，创办林场，群众是有积极性的。

县林业局向县委，省林业厅汇报办场计划，省厅领导同志认为，办场条件成熟，于是在七月，批准石垵林场正式成立。

（3）办场创业的艰苦历程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县委任命叶志光为石垵林场场长。

最早来到林场的是技术员，现为工程师的叶志谦与潘培秀。

建场伊始，第一批五十位工人，都是从周围的西坑、叶岸、梧溪、下垵、黄寮等等村庄挑选来的干部、党员、团员。他们响应中央关于“办好国营林场”的号召，带着茹丝、锄头、草刀、蓑衣、扁担、畚箕、桶、锅等农具家具，翻山越岭到吴垵。其中十二位，就挤在一座不避风雨的破屋里。露天搭锅，竹篱当床，买点盐得跑三十二里外的西坑去。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他们有颗消灭荒山，绿化祖国的雄心，便以苦为荣，在偏僻的山沟里安家落

户。

冬天早晨，海拔一千米的高山上，气温降到零下七度，树枝挂满了一尺多长的冰棱，干部、技术员、工人仍然穿上草鞋去拓荒。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他们常常带着饭包上山，肚子饿了，只把饭包放在胸口暖一暖就吃了。

夜晚，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打着电筒上山整地“放卫星”；一路点着汽灯打屋基盖宿舍。

次年春天，王宝元带领叶守尧、刘化群、纪圣潘，去竹苗林区的东家寮开发。四人挤在草寮棚下，里面放两张床，石头当桌。白天，他们掘山造林，夜里，还轮流到山上放火炮、敲铜锣驱赶猴子、野猪等野兽。

正当林场起步前进时候，偏偏碰上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上级下令要下马：动员职工离场。五十二位职工，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二十三名。留下的也产生畏难情绪，不少人主张“路湿早脱鞋”，快点散伙。在这关键时刻，党支部立即组织职工学习《为人民服务》，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联系实

际，开展回忆对此，进行前途方向教育。大家信心又足了，尽管口粮紧缺，职工们还是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冒着雪霰子，雪花，上山挖蕨根洗山粉。一九六〇年秋，共挖山粉二万多斤。职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终于度过了难关。

一九六三年七月，温州三十一位青年到林场落户。他们跟大家一起奋战荒山。年龄最少的还只十六岁，最大的还是二十岁。这期间，有的去参军，有的去读书，有的调离。直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石垟林场驻温林副产品门市部成立，他们才陆续返温经营。

温州青年在石垟林场建设整整二十个年头，他们为林场建设作出一定贡献。他们参加经营管理，帮助林工办夜校学文化，并积极做好流通木材，搞活经济的工作。

经过八年奋战，育苗310亩，选林25259亩，抚育57307亩，基本改变了昔日的荒凉旧貌。

其间，担任林场场长的有林炳齐、郑明体、彭正，刘际锁、王笃芳。

（二）保卫发展（1966.5—1978.12）

“文革”期间，各级领导同志受到冲击，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石垵林场地处文、景、泰三县交界，大片森林被投机倒把分子看作牟取暴利的摇钱树，林场面临一场严重的斗争。

文革初期，大批坏人到林区破坏森林，贩运木材，每天都有几千人肩背车运冲过林场，并逐渐侵犯和蚕食国有林木。场领导组织广大职工，投入打击破坏山林的战斗。可是，那些贩卖木材的投机者诬蔑说：东坑是帝国主义，林场是封建主义，要彻底砸烂。因此，这班家伙便恐吓林场职工，说要踏平林场。但是，林场职工毫不畏惧，积极投入护林斗争。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下垵公路一共摆满了九十三辆装满木头的板车，下垵乡政府立即打电话报告情况。林场得悉消息，马上组织人马拦截。运柴人一是先行宣传，说要林场职工“高抬贵手”，不要阻拦；二是背棒自己压阵；三是准备战斗，强行通过。林场工人在党委的指挥下，一是不怕，二是说理，三

是坚决阻拦，最后截下部分板车木头。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南田区黄寮乡黄垵坑群众借口放白木耳砍柴，林场坚决不同意，而黄垵坑群众五十多人，便包围石角，打伤老工人廖运验，小青年周宗设，还把林场副主任张志满打脑震荡。但工人仍然坚持斗争，把砍倒的树木作了处理。一九七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瑞安平阳坑有一批木材投机倒把分子，结伙贩运木头，经过石角林区时，被护林员叶昌益同志发现，他不顾个人安危，开展说理斗争。知识青年郑明成闻讯赶到，那批家伙见势不妙，抢走猎枪，把护林的三人绑在深山的树上，竟毒辣地用手帕塞住口，夹上棍棒，毒打一阵，仓皇而逃。这三位同志经过抢救脱险，马上投入追捕坏人的战争。遍体鳞伤的郑明成同志，坚持与工人一道，连夜追赶五十里，终于在当地党委的支持下，把行凶的投机倒把分子缉拿归案。

十多年来，林场职工以民兵为主体，由人武部长刘方丑组成30至50人的护林队伍经常巡视。跟破坏山林者的交锋，大大小小

700多次，拦下约5000多立方米木头，全部交给国家。林场职工在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中，有四十五名职工被坏人打伤，其中重伤十八人，有两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职工用鲜血保护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林业，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

保卫发展的十年间，担任林场党委书记、场长（主任）的有彭正、吴宪林、林炳齐。

（三）改革前进（1979—1989）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曾任林场党委书记、场长的林炳齐、叶志谦、吴昌道、朱隆重、吕赛核、施明庚等同志带领广大职工群众，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创林场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改革管理机构。撤销了吴垵、水牛塘两个分场机构，把原来总场核算、三级管理改为场部统一核算，二级管理。同时，调整充实了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班子和生产、财务、供销办公室等职能部门的骨干力量。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全面建立，不断完善计划、财务、物资、劳动、技术、生产定额等

各项管理制度。

三是改变分配方式。根据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林场在农业、牧业推行生产责任制，在林业生产中实行定额管理，在木材加工中实行按件计酬，汽车运输业搞了单车核算，並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后来，林场对职工实行全年劳动负担额制度，超额者奖，缺额者赔。同时，建立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核定基数、上交利润”等等多种形式的生产、工作责任制，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发挥了主动性。

四是调整产业结构。几年来，林场提出“背靠青山，面向社会，立足本场，搞活经济”为指导思想，扩大了食用菌生产规模，广开了驻温林产品门市部的经营门路，和招待所、饮食店的门路，並办起联营麻纺厂，鼓励职工办起文成食品罐头厂，为消化剩余劳动力，增加职工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五是进行林木良种建设。在工程师、副场长潘培秀的带领下，继六十年代的在水牛塘林

区的“优树”和“六大木比较”试验成功的基码上,一九七九年,在干坑林区又建立本省出名的柳杉种子园212亩。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石垌林场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基本建设,改善了职工生活,发展了教育事业,促进了党群工作。

目前,石垌林场的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石垌林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编 后 话

本期文史资料仍然属于综合性质。为了继承上期系统介绍我县各建制镇、场的史料，本期发表了《玉壶镇简史》和《林海春秋》，以飨读者。畚族在我县有两个民族乡，一万多人口。他们有独特的历史、风俗，本期发表了《畚族风情》，仅是片鳞只爪，希望今后能收到这方面更多的稿子。抗日期间，我省大部地区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浙江省部分机关和瑞安县一些机关团体，迁来大岙一带，当时大岙镇十分闹热，各种事业，都有很大发展。本期发表的《抗日时期大岙合作社》、《抗日时期大岙卷烟业》等文，都是当时的史料。本期还发表了多位人物传记。他们都在一生中干了一些叫人称道的事情，值得我们怀念。

文成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在编辑本期文史资料时，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和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我们各期文史资料的编辑印刷工作，大家认为：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文成县文史资料已在全县范围起了一定的影响，为我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江泽民同志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我们坚持爱国主义方针，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我们也看到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如稿件涉及的面还不广，撰稿人数不多，史料的考证，文字的修改和印刷的校对等等都需要我们今后去努力改进。并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帮助指正。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